往矣集目次

『汪精衛先生行實錄』序

東莞張次溪君，編了『汪精衛先生行實錄』一書，要我做一篇序。我平生沒有爲人家的著作做過序，所以序應該怎樣做，實在不大內行，但是爲　汪先生的言行實錄做序，却不是敷衍應酬的文章，而是有意義，有價値的筆墨。所以特把自己的感想寫出來，聊當做這本書的序文。

這本書分做四部。第一部爲年譜，第二部爲著述年表，第三部爲庚戌蒙難實錄，第四部爲行實錄。此外還有一篇北京銀錠橋史蹟志。　先生的道德文章，學問勳業，大都均網羅在這一本册子的裏面，使當今及後世景仰和崇拜　先生的人，能夠得一種有系統而綜合的資料，以研究　先生的思想，傳述　先生的事業。所以這本小册子，在思想上和歷史上，無疑的是有很大的貢獻的。

我乃是中國國民黨的後輩，雖然在庚戌以前，還是鄉村一個髫童的時候，就聞了　先生的大名，但是直到民國十三年春天，於無意之中，纔在上海第一次瞻仰　先生的風采。那個時候，國共已開始正式合作，共產主要份子，有許多已加入了國民黨。毛澤東也加入國民黨，做宣傳部的秘書。我那時因爲還在日本京都留學，所以還是共產黨員，沒有加入國民黨。我由日本囘到上海的時候，赴國民黨黨部去看他。當時黨部是在環龍路四十四號。當我和毛正談得起勁的時候，忽然一位身材高大的偉丈夫，破門而入。我當時不知道是誰，毛替我介紹道：『這是　汪先生。』一位神仰十餘年的革命先輩，忽然從天而降似的站在我的面前，一個渺小的學生，眞是手足無所措，不知道說甚麼纔好。毛報告我的名字之後，　汪先生似乎知道我的名字，和我握手，並寒暄了幾句，然後和毛談了一刻的事務。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　先生的經過。

晤談雖然只有片刻，我立卽感覺到和這樣熱誠的人物接近，眞正如坐春風之中，使人溫暖，使人愉快，使人心醉，我又立卽感覺到這位人物，對於羣衆的魔力，對於羣衆的吸

引力，一定不小。我因此又感覺到這位人物，將來一定是有着廣大羣衆擁護的政治家，一定是能夠領導廣大羣衆去奮鬪的革命導師。這便是我第一次拜見　先生時的印象。我的印象的正確，以後的事實替我證明了。

民國十三年赴廣州，參加國民革命以後，瞻仰　先生的風采和言論的機會較多，對於　先生的景仰更進一層。二十六年事變發生以來，深談的機會更多，　先生的爲國之忠，用心之苦，治事之勤，赴義之勇，任難之毅，使我得了不少的薰陶和感召。自從發動和平運動以後，出死入生，追隨左右，至今將近五年。其中所經的危難困苦，不是筆墨所能形容，而　先生安之若素，應之以定，絲毫沒有因爲危難而稍餒其氣，稍變其志，所以纔能以赤手空拳，奠定還都大業，使中國於軸心國家之中，占一重要地位，而角逐於國際舞台，這樣的勳業，其根本的動力，全在　先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慈悲而勇毅的精神。

要敍述一位偉大人物思想性格的全部，是不容易的。好像泰山之巍峨，滄海之浩瀚，

我們不容易描寫其全貌一樣。我現在只就一點，略為說明。

我要說的，就是　先生的民主精神，無論對同志，對部下，無論做大事，做小事，都是循循善誘，諄諄訓誨，務使同志或部下，明瞭這事的原委，明瞭何以要做這件事，明瞭這事如何做，然後纔命令去做。他決不以命令叫人盲從，決不沒有指示使人妄動。封建時代的專制，近代的獨裁，也決不屑採取的。他能得廣大羣衆的擁護在此，能毫無憑藉而創業也在此。

在去年全國司法會議的時候，我去訓話，中間有一段，大意是推行政令，有兩個工具，一是司法，一是教育。司法是迫之以威，教育是喻之以理。但是中國古代是專用司法一類的威力，而不大採用教育爲工具的。法家的政治思想不必說，就是儒家的政治哲學，也是一樣。我們看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訓語，就可知道。『使由之』就是以命令強迫去做，『不可使知之』，就是不要以教育使人民了解。我覺得這是不對的。要使人民完全『知之』之後，纔使之『由之』，固然政治效率一定遲緩，而且有時也不可

能，但是至少務必儘量設法去使人知，至少務必使中堅份子知之，專制和獨裁，或者可用以應變，而不能以之處常。這便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先生對同志和部下，常不惜舌敝唇焦去訓誨，去說明，就是要使人『知之』。這一點，我非常敬服，所以特別提出來說。

要說的話很多，如果一直寫下去，這篇序的本身，要成爲一本書了。現在就此擱筆，不知道這篇感想，能不能算是一本書的序文。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九日周佛海序於南京迎賓館。



苦學記

樸兄屢次要我爲古今寫一篇東西。提起作文和講演，我現在比甚麼都怕。因爲還都兩年以來，以前所期冀，所談過的事，大部分沒有辦到。全面和平，遙遙無期，國府強化，尙待努力。所以我決心就自己的本位，就自己的責任，一聲不響的一點一滴的切實工作，非萬不得已，一不作文，二不廣播，三不發表談話，四不公開講演。因爲以前說的話也太多了，既然大部分都沒有實現，還有甚麼意思向大衆說話？這便是我年來的心境。

不過古今的文字是軟性的，樸兄又再四相託，所以乘着星期日比較空閑的時候，把幼時苦學的經過，再來回憶一次，一則可以借此自己再鞭策一番，二則對於現在在困窮中的青年，也許可以相當的鼓勵。

辛亥武昌起義的時候，我纔十五歲，在鄉村一個私塾裏讀書。第二年民國元年，我們

鄉下有幾個學生，都進城考了高等小學。我的消息很慢，等到考期已過，我纔知道。於是請求母親准許進城運動補考。到了城裏探聽，知道距發榜的日子，只有三天，絕對不能再考了。我那時非常失望。湊巧那時縣政府的教育科長，是我鄉下的呂鶴立先生。我便請他寫了一封信給小學校長。居然得到允許了。因爲這是我一生發軔的起點，現在還很清楚的記得。我一個表兄，當時在中學讀書，送我去考。補考的只有我一個人，在窗明几淨的校長室考的。國文題是『愛國說』，還有兩個加法的算術。國文完了卷就做算術。算術的答案，我沒有把握。湊巧這時校長不在房間，我的表兄在窗外探頭探腦的向內張望。我便把算術答案給他看。他輕輕的由窗外告訴我說，尾數上少了一個圈。於是我把圈加上，考試就算完了。考雖考了，究竟能不能取，還是一個問題。因爲當時許多年紀比我大，學問比我好的老童生去投考，而名額又不很多，所以非常擔憂。那曉得發榜的那一天，我竟中了第一名。當時眞是喜出望外！馬上帶信回家，報告母親，她老人家當然也非常歡喜。我自己想來想去，竟想不出何以會考得第一的理由。難道是校長徇教育科長的情面嗎？後來進

了學校，聽見閱卷的國文先生說，纔知道這個道理。原來我當時雖然在鄉下私塾，不知道從那裏弄得兩本梁任公的『中國魂』，讀得濫熟。我就學他的文筆，把許多新知識、新名詞以及憂時憤世的論調，裝入『愛國說』文裏去。在當時風氣未開的小州縣，居然有這樣的文章，當然要考第一了。

我因為是第一名進學校的，所以在學校裏鋒頭頗健，被選為班長。第一年沒有甚麼事情；第二年開學之初，便發生問題了。原來學校裏有老生欺負新生的習氣。第一年我們被人欺負，第二年輪到我們欺負人了。有一次我們在上體操的時候，有一個新生坐在草地裏看。我們便說他不應坐着，要他馬上立起來。這位先生也很倔強，偏不立起。我們覺得太沒有面子，便私下商議散隊後把他圍着打一頓。居然三四人把他圍起來。我的一個年長同班，站在他的面前和他理論，並未動手。我立在他背面，先動手打他一拳。於是就大打起來了，被打的同學，到校長那裏去控訴。他只指出站在他面前的我的同班，而沒有指出我，因為我站在背後，他沒有看見。當時校規很嚴，我那個同班被開除了。我於是到校長那

裏去自首，請求處分。校長說我沒有被控告，而且也愛護我，不加以任何處分。我覺得對不住那位被開除的同學，於是自動退學，和他一起到長沙去。決心下了之後，便回家報告母親。母親痛誡了我一番之後，仍替我籌了五六十元錢，讓我出門。我父親早故，母親撫養着我和弟弟妹妹三人，艱苦度日，雖有薄田百餘畝，但是要籌幾十塊錢現款，實在是不容易的事。到了長沙，便進了湘西人士所辦的兌澤中學第二年第二學期。當時小學是三年，中學是四年。我以小學二年級第一學期的學生插入中學二年級第二學期，功課實在不易趕。一因功課很難，二因用費很大，實在不容易支持。湊巧呂鶴立先生由教育科長調任爲縣裏的中學校長，我便請得兌澤中學校的轉學證書，轉入本縣的中學。呂先生勸我不要太躐級，功課不易趕上，便許我插入了第一學年的第一學期。小學還差一年半，洗了一個澡，便進了中學，在當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進了縣中之後，既然可以時常菽水承歡，又可以節省用費，所以便拚命用功。我雖然不敢說「抱有大志」，但是上進之心，卻是有的，而且確有相當的抱負。但是就客觀的事實看，上進發展的機會和可能，實在沒有。出洋

？想都不敢想，那裏有這個希望！不單沒有出洋的希望，看見縣裏有一兩人進了北京大學，也只是徒然羨慕而已，根本不作此非分之想。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進高等師範，因爲長沙有個省立高等師範，一切費用，都是政府供給。這是貧寒學生唯一可能的升學途徑。但是名額有限，而貧寒學生那樣多，所以進高等師範，也不過是幻想中的安慰罷了。我想萬一不能升學，能夠謀一縣政府的書記，或者小學教員，也就心滿意足了。在學校讀了一年多之後，遇着袁氏稱帝，護國軍興，沅陵是軍事上必爭之地，北軍源源入境，學校也就停學了。在家無事，想起我父親在洪楊之役，入了湘軍的幕，因軍功而出身，我何不也去投軍？於是在袁氏死後，便得了母親允許，又到了長沙，想謀一個司書的位置。旅居兩月，百計不成。湊巧學校又將開學，於是又回鄉重複上課。當時臨澧鄧竹銘先生新來授歷史地理，深得他的賞識。那時我一面學做詩，一面讀東方雜誌等刊物，漸漸留心起政治來了。談到做詩，當時頗感興趣，師友又非常鼓勵，幼稚的作品，也做了不少。可惜到了日本之後，就不彈此調，現在一個字也做不出來了。初生犢兒不怕虎，當時膽子很大，到處題

詩。沅陵位居沅水之側，城東波浪洶湧的江中淺灘上，有一小洲，上有龍吟寺，寺中有七級的龍吟塔。某年秋天，和同學去遊，在壁上題了一首詩，事隔二十五年，據湖南來人說，那首詩現在還在壁上。故鄉幼時釣遊之地，時在夢中，不知今生今世，還有沒有還鄉，重溫舊夢的希望！那首詩雖然幼稚，現在還記得，特把它錄出，也可見當時的意氣了：

登高把酒飲神龍，拔劍狂歌氣似虹。
甘處中流攔巨浪，恥居窮壑伴羣峯。
怒濤滾滾山河杳，落木蕭蕭宇宙空。
不盡沅江東逝水，古今淘盡幾英雄。

因爲留心政治，居然隱隱有以天下爲己任之氣概。不是我自己誇張，恐怕每一個不安分的青年，都是有這個雄心的。袁氏死後，內閣常常更動，一下某甲入閣，一下某乙入閣，在看報之餘，居然也想將來要入閣了。我們學校擴充，把附近的文昌閣，併入學校做宿舍。我因爲常常想將來一定要入閣，替國家做事，所以和同學說到文昌閣去，便說『入閣

』。譬如課後要問同學『你甚麼時候到文昌閣去』便說：『你甚麼時候入閣？』但是主觀上雖然有這種氣概，客觀上上進發展的機會，可以說是絕對沒有。眞是前途黑暗，四顧茫茫！當時因爲常看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書籍，知道商務印書館有學徒學校，很想託人介紹到商務印書館，做一名學徒，到上海去謀發展。但是就是這一條路，想了很多的方法，也沒有走通。

命運之說，說不靈有時也覺得似乎奇怪。我一生的遭遇，總覺得都是命運的支配。我現在能夠有這樣地位，負這樣的責任，決不是我的聰敏才智所得到的結果，完全是僥倖。僥倖，就是命運。我作此說，好像是迷信，但是人定是否能勝天，確是一個疑問。我最怕的是辦財政和外交，而現在却不能不負財政的責任，且實際上常當外交之衝。我以爲教育工作沉悶，極不感覺興趣，但是却做了三年大學教授和六年教育廳長。這樣事與願違，不是命運是甚麼？出洋留學，我做夢都不敢想。但是命運却造成我留學日本的機會，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我家距城二十餘里，在沅水的南岸，我每兩週返家省親一次。星期六回家，星期一進城，習以爲常。每次步行，賞玩着沿途的青山綠水，倒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民國六年五月某日，照例返家，遇着山洪暴發，沅江水漲，不能渡河進城。於是在家住了四天，等着水退。那曉得我一生的運命，就在這四天决定了，而我還在鄉下，一點不知。等到到了學校，一個朋友對我說：『老周！你可以到日本留學去了，最近就動身。』我以爲他是開玩笑。他說：『你不相信，我和你去見校長。』見了校長，果然是眞！原來我有個同班的朋友，他的哥哥在東京，前一年把他叫到東京去了。他來信說東京生活程度並不貴，每年只要百五六十元，如果肯用功，一年之後，就可以考取官費。我的好友郎詩齋便發起湊錢送我去。呂先生立卽拿出了三十元，那個時候的三十元，比現在的三萬元還要値錢。於是先生和同學，一共湊一百三四十元。我高興極了，雖然一年之後，不見得考取公費，但是這乃是唯一遠走高飛的機會，不能不冒相當的危險。於是立卽回家，稟告母親。他老人家極不願意，一則因爲出洋兩字，使他老人家覺得要不知出多遠的門，捨不得我遠離膝下。二

則因爲如果考不取公費，家裏又無力接濟，深恐流落異邦。不過當時愛子和望子成名心切，只好忍痛一時，並且東挪西扯，爲我籌了幾十元，湊成了二百元。離家之日，母親不忍送我，躲在廚房中暗泣，我到廚房中揮淚拜別了母親，從此便做了天涯遊子了。以前雖然兩次到長沙，但是時間很短，而且路也不遠，所以還不覺得難過。現在出這樣遠的門，又不知何時還家。所以母子分離的痛苦，特別感覺得深刻。朝發蘆林潭口占說：

溟濛江霧暗，寥落曙星稀。世亂民多散，年荒鬼亦飢。
心傷慈母線，淚染舊征衣。回首風塵裏，中原血正飛。

詩雖幼稚，足見孺慕之心了。前幾年雖然兩次奉養來京，但是老人總不願久離家鄉，事變初起，就再回鄉。我參加和運之後，曾兩次派人奉迎，均以路遠辛苦，沒有得到老人的允許。到現在音問隔絕，生死不明。寫到此處，眞是痛不欲生了！

離開沅陵的時候，還有一段佳話：有一位女士，是我們同學的親戚，在桃源女中讀書，地方風氣未開，女子出門求學，當時實在是鳳毛麟角。我在同學家見過她三次，因爲當

時男女交際還不公開，所以從未交過一語。我當時在縣裏，微微有點小名，所以平常彼此都相當的傾慕。我在啓程的前兩天，忽然接得她一封信和四首詩，事隔二十餘年，詩已忘了，大意是仰慕和鼓勵，其中有『遙送君行暗舉觴』一句。因爲『遙』和『暗』兩個字用得很深刻，所以我至今不忘。當時也囘了她四首詩，現在都已忘記了。後來聽說她嫁了個外鄉軍人，很不得意。現在不知飄泊何方，可嘆！

同行還有兩個同學，三個人都不通日語。先到長沙，坐直航上海的船，坐的不單是統艙，而且是運滬的米包上。當時懷着乘風破浪的壯志，也不知道甚麼是苦。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一家湖北人開的小棧房。三個土頭土腦的鄉下人，到了五花八門的上海，簡直手足無所措。只好托棧房的人，買日金和船票，後來纔知道被他們騙去了不少的寃枉錢。

到了長崎上岸，有中國酒店四海樓派人來接，稍事休息，晚上就坐火車。開車不久，我忽想大解。當時不知道車上有便所，可以解手，每次停車，看見了 W. C. 想下去大解，又怕車開，所以一直忍了八九小時，到了門司纔得輕鬆，眞是一個大笑話。車上買飯吃，

看見筷子只有一根，有個同學說：『一根筷子怎好吃飯？』我自作聰敏的說：『折斷成兩根，不是可以吃嗎？』於是三人都折斷了，大家覺得日本筷子這樣短，眞不方便。後來看見附近一個日本人吃飯，他吃飯拿着筷子，不是折斷，而是分開，於是三人相視而笑。到了東京，按着地址，用筆談的方式，叫了三輛人力車，送到本鄉的稿起館。於是有許多同鄉便來招待我們了。

到東京是七月底，於是開始學日語並補習其他科學。我雖是貧寒出身，但是用錢却手面不小，到了十二月，錢已用完了，今後怎麼辦呢？就算是公費考得取，也要到明年七月，以後半年怎麼支持？家裏接濟，是萬不可能的。眞是天無絕人之路，那時湖南發生南北內戰，匯兌不通，所有在東京的湖南自費生，都不能得到家庭的接濟，於是大家跑到公使館請求救濟。結果每人得了一百元，這又可以支持幾個月了。那時段合肥當國，與日本簽訂軍事協定，日本留學生，羣起反對。一面分派代表回國到北京上海去運動學生，一面鼓動全體返國。留日學生到北京策動，和北京大學學生相聯繫，遂發生了所謂五四運動。國

內國外的學生運動，相激相成，越鬧越大，於是東京留學生大多數都主張回國了。我雖然是初到東京，但也是主張回國最激烈的一人。如今回國空氣已造成，我自己焉有不回國之理。以前完全沒有想到個人問題，現在真要回國，於是個人種種難題，都不能解決。第一，旅館欠了三十餘元，有甚麼法子可以還清？三十餘元，現在覺得問題很小，當時實在比天還大。第二，回國的川資到那裏去籌？最要緊的，還是第三，到那裏去？到京滬去做愛國運動嗎？吃甚麼？生活都不能維持，能做甚麼運動？回老家嗎？不僅是沒有意義，而且好容易能夠出來，這一回去，就要老死溝壑，今生今世，再沒有出來的希望！不回國嗎？又萬萬不可以。於是左右爲難，進退維谷，眞苦死了。好在我到處人緣都好，朋友都肯幫忙。有個朋友說，旅館欠債替我付。另一朋友爲我籌三十元作川資。但是到那裏去呢？這個問題仍然不能解決。於是還有個朋友說：『你回國是不能不回的。但是飯都沒有吃的，那能做愛國運動？我看你還是回國謀一位置，每月積一點錢，過幾個月再來罷。我有個朋友在奉天安東縣辦厘金，我介紹你到那裏去罷。』計劃既定，於是便坐車到下關，渡海到

朝鮮，從朝鮮到了安東驛下車。厘金卡還在數十里外的鄉下，于是再雇民船，沿鴨綠江而下。到那裏一看，滿目蘆葦，幾家土屋，眞是荒涼得不能以文字來形容。那位同鄉看見我到，愁眉苦臉的說：『我這裏局面小極了；除我外只有八個巡丁，你來有甚麼辦法？旣然來了，只好住一住再講。』於是我積錢再去留學的夢，又不能實現了。前途渺茫，走頭無路。當晚夢見回家，倒在母親懷中痛哭。一個人到了山窮水盡的時候，就想起母親的慈愛，也只有母親的慈愛，纔能鼓起我們的勇氣。這乃是天性。每日徬徨海濱蘆葦中，幾欲跳海自盡。私念此生休矣！想不到我的生命，會斷送到這樣荒涼的海邊。過了兩星期，接到東京朋友的信說，回國的人並不多，第一高等學校，考期快到了，有許多人已報名，叫我何妨再去考一考。我想第一高等是最難考的，許多在國內有名的中學畢業，到東京預備了三四年，還有考不取的人。我中學沒有畢業，又只預備幾個月，那裏考得取？但是除了這條路之外，那裏還有第二條路可走？只得破釜沉舟的去！與其死在荒涼的海濱，不如到東京去流落！於是向那位同鄉借了二十元，沿路節食省用的到了東京。這個時候，已是一

錢莫名了。不得已搬到原住的旅館，欠着賬住下去。這個時候，距考期只有三星期。名額只有五十名，而投考的却有六百多。我那裏會有希望？這三個星期中間，日以繼夜的趕着預備。到了考的那天，我只有半枝鉛筆，向朋友借了一毛錢，買一枝新的，並借了一件傳和服穿上。因爲沒有錢坐電車，所以把鉛筆放在衣袖內，緩步徐行的走去。照道理說，我心裏一定很慌。但是當時我却非常鎭定。一個人在患得患失的時候，心裏一定着急。如果眞的絕了望，也無所謂了。我當時斷定是考不取的，此次不過是盡人事而已，好像一個囚徒已經綁上法場，還有甚麼怕的。當時因爲沒有心亂意煩，所以頭腦非常清楚。這不單是我一生的成敗攸關，而且是生死關頭，所以和當年考小學時候一樣，記得很清楚。上午考數學，四個算術題，兩個代數題，一個幾何題。我的性情，與數學極不相近，所以我認爲第一場是個最大的難關。進了考場，把手向袖內一摸，昨天借一毛錢買的一枝新鉛筆，不知何時在路上丟掉了。預兆這樣不好，還有甚麼希望呢？索性死心塌地不管，拿着半枝鉛筆去解答。過了一小時後，做對了五個題目。還有一個代數題和幾何題沒有答案。看看時

間還早，把幾何題拿來再做，却被我做對了。於是精神爲之一振，再去做那個代數題。出於意料之外的，也做對了。這一難關突破，我便生出多少希望來了。下午考英日文的互譯。這一點我有相當的把握，成績也還不錯。於是第一天的考試，便覺得心滿意足了。第二天上午考物理化學。在國內既然沒有學過，到東京又沒有多預備。把兩本很厚的借來的書，悶悶的翻來翻去，看見有許多地方，有鉛筆的記號。我靈機一動，以爲這些都是要緊的地方，所以單選這些地方去死記。誰知第二天所出的題目，都是昨晚曾經死記過的。於是這個難關，又被突破了。下午考日文作文，便胡亂的做了一篇，也不知好歹。最後一個難關，就是日語面試。這却把我爲難了。當時日語程度很不好，預備也來不及。只好聽天由命了。因爲我報名得晚，所以排在第四天面試。第三天下午，悶悶不樂，跑到中國青年會去看中國報。偶然遇見一個同考的，我問他已否面試。他說上午已經試過了。我便問他問些甚麼話。他說『還不是隨便問，例如你是湖南人，也許問你湖南打仗的情形。』我便跑去請一位老留學生，編了一篇湖南打仗的情形，拿來死讀。第四天面試的時候，是一位叫

做今井的考先生。他問你是周某人嗎？我說是的。他看看我的報名單，就說你是湖南省的人嗎？我又答一聲是的。他又問我說：『湖南現在打仗的情形怎樣？』我便把昨晚背熟的，滔滔不絕的讀了一遍。他便不問我第四句話了。如果他再問我一句，我便要窘態畢露了。於是全場考試，就此完結。

考的時候不着急，考完了倒急起來了。如果考不取，怎樣辦呢？想去公使館做一個當差的工友。萬一連這個都辦不到，就想到華僑的商店去謀當一名伙計。這樣胡思亂想的過了一星期，聽說發表了。趕快的跑到學校去看榜。我想萬一我考取，一定名字列在最後。所以我不敢從第一名看起往下看，却從最後一名倒往上看。看了一大半，沒有我的名字。我從頭上冷起，一直冷到腿上。快要冷到脚尖倒下去的時候，看到第四名却是我的名字。我疑心是做夢，把舌尖重重的咬了一下，感覺得很痛，於是我知道不是夢，是眞的。從此我生活不成問題了。從此我可以求學，一直到帝國大學畢業了。當時心中的愉快，不是言語可以形容的，馬上寫信去報告母親。考第一的是郭心崧，現在昆明，做郵政總局局長；

第二是以後成爲左翼作家的鄭伯奇，第三是重慶交通部次長彭學沛。

現在，和我當時一樣困苦的青年，不知道有多少。大家不要灰心，不要餒氣，不要落膽，不要絕望！天無絕人之路，一根草有一滴露水養的！只要我們肯幹，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可以從重重包圍之中，殺開一條血路！



扶桑笈影溯當年

一個青年，要有理想，有抱負，有野心。否則，便沒有靈魂。有了理想，抱負，和野心，而又要刻苦，鍛鍊，和努力。否則，便是狂妄。不是我自負，我在青年時代，是有靈魂的，同時，也決不狂妄。我幼時的抱負和苦學的情形，在『苦學記』中已經寫過了。不過那篇文章，只寫到渡日留學，考進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時爲止。現在把那個時候以後，留學期內的生活情形，以及暑假回國，從事社會運動的經過，略述一個大概。

那個時候，我國政府指定了五個日本國立的學校，凡是考進這五個學校中之一的，都給官費。五個學校，就是第一高等（畢業後入帝大），高等師範，高等工業，高等商業，和千葉醫專。五個學校之中，最出鋒頭，最爲當時的女學生所傾慕的，是一高的學生，戴一頂兩道白圈的制帽，披一件披風，腳下卻穿一雙『下馱』（木屐），在街上大搖大擺，

昂首高歌，略略做一些出軌的事，不但警察都不去管，社會人士，還認爲可愛。我當時一心一意，想進一高，而一高又非常難考，見着一高的中國留學生，非常羨慕。現在我居然考中了，兩道白邊的帽子，也飛到我頭上來了。這不單是有了官費，經濟問題可以解決，同時，我的理想也實現了。所以當時快樂的情形，遠超過老童生進學。發榜後，立卽向湖南留日學生經理處預支了一個月學費（那時每月是三十六圓），到房州去避暑，去海水浴。

開學以後，我就用起苦功來了。早上六點半鐘起，晚上十一點鐘睡，每日的十六七個鐘頭之中，休息的時間至多不過二小時。因爲要學的東西太多了，學校的功課，已經忙得不亦樂乎，單只外國語一科，有英文，有德文，有日本的古文。但是這些東西，決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慾，課外的工作，比課內的更多。第一，讀中國古書。第二，當時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思潮，非常澎湃，尤其是俄國和德國革命，對於青年予以不少的刺激，所以我對此很感興趣，這一類的書籍雜誌，努力去閱看。第三，我對於西洋歷史和當時的國際情形，也很有興趣，因爲那時正是第一次歐戰結束，國際聯盟成立的時候，所以搜羅這一類

的雜誌和書籍，也佔了我不少的時間。大約早晨起來，到學校之前，讀中國書，有時讀得起勁，竟高聲朗誦起來，不管隔壁的日本同學，討厭不討厭。上課回來之後，閱讀課外書籍，然後吃晚飯。飯後到帝大門前一帶舊書店去翻閱舊書，借以散步，大約一小時。晚上讀到十一時以後，從『押入』（壁廚）內裏把鋪蓋拖出來，納頭便睡。星期日上午，還是用功，下午步行到神田的中國青年會看看中國報，或訪訪同鄉。在一高預科的一年之中，每天都是這樣，不單是日本同學沒有交際，就是中國朋友，也少往來。不單是『芳原』（妓女區）『淺草』（遊樂區）沒有去過一囘，就是影戲院也沒有去過一次，只是星期日晚上，中國青年會演電影的時候，偶然去看看。每日唯一的娛樂，就是晚飯後跑舊書店。這個味道，印象很深，現在還常做這樣的夢。

因爲閱讀國際問題的書籍，也有多少心得，一時高興，做了一篇分析當時國際形勢並推測其趨勢的論文，投到留日囘國學生在上海辦的『救國日報』，居然登了出來，而且博得好評。我中學時代的史地教師鄧竹銘先生，遠道馳書獎勵，大爲稱讚。這便是我的處女

作。

這樣的生活，過了一年。預科畢業，照例要分發了。當時日本只有八個高等學校。我因爲要選擇一個淸靜的地方，所以要求分發鹿兒島的第七高等學校。

鹿兒島在日本的南端，風景秀麗，氣候溫和，人情樸實，是西鄉隆盛的故鄉，眞是一個很好的地方。那時七高，有十三四個中國學生。我任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時，爲我做了兩年多科長，我任江蘇教育廳長時，爲我做了五年多的祕書，後來我任宣傳部長時，又爲我任祕書的陳天鷗，就是當時的同學，先我一年到鹿兒島。我離開了重慶之後，他現在還在任宣傳部祕書。幫忙我十年的老友，現在還沉浮於宦海中，不能展其抱負，我心中委實抱歉，加以現在關山遠隔，魚雁難通，落月尾梁，那能令人不懷舊雨而感傷呢！

第一年除學校功課以外，專門只看社會主義的書籍，國際問題的書籍，沒有工夫再看了。讀書之外，作文譯書的興趣也大增加。這一年譯了『社會問題概觀』一書，約六七萬字，賣給中華書局，得稿費一百二十元。這個款子，留作暑假回家省親的路費。當時梁任

公一派的人，在上海辦有『解放與改造』半月刊，我常常投稿，都登載出來，稿費非常豐富。這種稿費，大部寄回家養母，一部拿來買書。

課外的娛樂，就是遊山玩水和看電影。海灣中的櫻島，是大正四年發火的火山。我去時山頂常常還冒煙，島上的枇杷和蘿蔔，味道特別的好。我和幾個同學常於星期搖着小艇，渡海上島遊玩。每日下午，不是一個人騎脚踏車，沿着海岸到名叫磯濱的海岸去看海，就是登學校後面名叫城山的山頂去遠眺。看電影的朋友，就是陳天鷗。晚飯後，兩人談起電影，便不顧風雨，由我們住的叫做城谷的地方，步行到電影區天文館通。來回約有七八里，我們常常在大雨之夜，兩個人打一把雨傘，赤着脚穿一雙高跟『下駄』，跑去看電影。有時有好影戲，而錢却用完了，官費還沒有由東京寄來，兩人便只是乾着急，希望郵差光臨。但是郵差如來，而所送的是平信，仍舊失望，因爲匯款的信，都是掛號的。我有時開他的玩笑，由外面進去，大聲喊『書留！』（掛號信）他以爲送匯款的郵差到了，出來一看，原來是我。有時等郵差不到，而周圍菜園上肥料，臭得心煩，於是大吟『前後

有蓋桶，往來無郵差』以自遣。

民國九年夏天，決心回沅陵省母。打一打算盤，除卻往來川資外，所得稿費所餘無幾。想做一套西裝，算來算去沒有錢做，於是只好穿着學生裝回國。那曉得一到上海，便不能再往前進了。因爲那時張敬堯督湘，我們的湘軍，舉起驅張，戰事緊張，道路梗塞。這個情形，我在鹿兒島完全不知道，這次回家，完全爲省母，如今不能達到目的了。回想三年前離家出國之時，母親自己傷心，而又怕我傷心，躲到廚房，背着我飲泣的情形，恨不得立卽就跪在母親膝下，倒在母親懷中，去安慰他老人家。但是千里迢迢，除卻望白雲而灑思親之淚之外，有甚麼辦法呢？寫到此地，遙想母親現在不知在甚麼地方，不知情形怎樣，眞是痛不欲生，到了現在還用三國時代的辦法來從事政治，實在沒有甚麼意義。

旣然不能回家，打算到杭州去玩玩。動身之前，去時事新報館訪張東蓀。他是『解放與改造』的主持人，我因爲投稿的關係，和他常常通信。我到了報館，他還沒有到。有個姓俞的編輯出來招呼，不久來了一人，大約是研究系的相當重要的人，隨梁任公遊歐回國

的，姓名記不清楚了，俞替我們介紹。他介紹我說這是周某人，是做文章的。他的介紹實在沒有錯，但我却萬分不高興。我當時抱負不凡，深以將來的大政治家或革命領袖自命，如今却被人叫做『做文章的』，把我當做一個單純的文人，因此感覺到是一種輕視。文人，自然有文人的價値和重要，但是我當時却志不在此。後來東蓀來了，却談得非常投機。他們當時組織『共學社』，翻譯名著，請我也譯一本，我便擔任翻譯克羅泡特金的『互助論』。

到西湖住在智果寺，每日除譯書、看書外，便和幾個朋友划船、登山，有時竟跳到湖中游泳。西湖附近的名勝，沒有不到過的。但是西湖夏天熱極了。夕陽西下後，湖水把熱氣反射出來，尤其覺得蒸熱。住了三個多星期，因爲熱不可耐，仍舊回到上海。

到了上海，張東蓀告訴我，陳仲甫（獨秀）要見我。仲甫本是北大教授，主辦『新青年』鼓吹新思想，爲當時的當局所忌，所以棄職來滬，『新青年』也移滬出版。有一天我和張東蓀，沈雁冰，去環龍路漁陽里（現在似已改爲銘德里）二號，去訪仲甫。當時有第

三國際遠東代表俄人吳庭斯基在座。吳大意說：『中國現在關於新思想的潮流，雖然澎湃，但是第一太複雜，有無政府主義，有工團主義，有社會民主主義，有基爾特社會主義，五花八門，沒有一個主流，使思想界成為混亂局勢。第二，沒有組織。做文章，說空話的人多，實際行動，一點都沒有。這樣決不能推動中國革命』。他的結論，就是希望我們組織『中國共產黨』。當天討論，沒有結果，東蓀是不贊成的，所以以後的會議，他都沒有參加。我和雁冰是贊成的。經了幾次會商之後，便決定組織起來。南方由仲甫負責，北方由李守常（大釗）負責。當時所謂南陳北李。上海當時加入的有邵力子，沈玄廬等。戴季陶也是一個。不過他說，孫先生在世一日，他不能加入別黨，所以『中國共產黨綱』的最初草案，雖然是他起草的，他卻沒有加入。這個時候，只有籌備組織，還沒有正式成立。預備在一年之中，於北京、漢口、長沙、廣州等地，先成立籌備性質的組織，然後於第二年夏天，開各地代表大會，正式成立。我在計劃擬定，分頭派人工作的時候，恰當學校要開學，所以就回到鹿兒島的學校去了。

我為甚麼贊成組織共產黨，而且率先參加？第一，兩年來看到共產主義和俄國革命的書籍很多。對於共產主義的理想，不覺信仰起來；同時，對於中國當時軍閥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滿，而又為俄國革命所激刺，以為非消滅這些支配階級，建設革命政府，不足以救中國。這是公的。第二，就是個人的動機。明人不做暗事，誠人不說假話，我決不隱瞞當時有個人的動機；我決不說假話，說當時的動機，完全是為國為民。不過個人的動機，不是升官，不是發財，不是享樂。當時如此，以後如此，現在亦復如此。提起個人享樂，沒有這樣笨人，做這樣笨的事。就是現在，也許有人以為我們的和平運動，為的是個人享受。其實冤枉萬分。據我個人現在的情形說，最愛的電影不能去看，最愛的舊劇，不能去聽，想去逛公園而不得，想去蕩馬路而不行。在家好像籠中的鳥，出外好比被押解的囚徒。每日生活，也不過日食三餐，夜眠一榻，不能像以前軍閥官僚亂作胡為，窮奢極慾。不單如此，連普通人能享的福，也不能享，普通人能做的事也不能做。這種情形，還是享福？還是受罪？當時雖然是個窮學生，不能預知現在的情形，但是確確實實志不在此。當

時所謂個人的動機，就是政治的野心，就是 Political Ambition。在一高的時候，正是巴黎和會的前後，各國外交家都大出鋒頭。所以當時對於凡爾賽，非常神往，抱負着一種野心，將來想做一個折衝樽俎，馳騁於國際舞台，爲國家爭光榮的大外交家。後來研究俄國革命史，又抱着一種野心，想做領導廣大民衆，推翻支配階級，樹立革命政權的革命領導者。列甯，特路茨基等人物的印象，時縈腦際，輾轉反側，夙興夜寐，都想成這樣的人物。雖然現在年將半百，一事無成，但是當時意氣之豪，實可以上衝雲霄！懷着這樣野心的青年，又值着中國政治腐敗，世界革命怒潮高漲的時候，那得不本着創造的精神，去組織一個新興的革命黨！這便是我參加發起『中國共產黨』的原因。

回到鹿兒島之後，除掉上課以外，仍舊是研究馬克斯，列甯等著述，和發表論文。同時，我想要領導羣衆，除却論文，最要緊的是演說。所以糾合十幾個中國同學，組織了一個講演會。每禮拜講演一次，練習演說。當時同學都說我有演說天才，說話很能動人。我聽了這些獎勵，越加自命不凡，居然以中國的列甯自命。現在想起來，雖覺可笑，但是在

青年時代，是應該有這樣自命不凡的氣概的。

我約了幾個朋友，租了一棟房子，自己弄伙食。每天有中國菜吃，生活比較在東京舒服。但是窮苦的地方，仍舊很多。一雙襪子不破底，決不去換。夏夜蚊子多，沒有錢買蚊帳，而又怕點蚊煙，只好拿了張報紙來蓋頭。蚊子雖然可避，報紙的油墨氣，實在難聞！這一年譯完了一本『互助論』。

接着上海同志的信，知道七月間要開代表大會了。湊巧是暑假期中，我便回到上海。黨務發展得眞快，不單是我們去年計劃的上海，漢口，長沙，北京，廣州，都成了組織，就是濟南也有了支部。當時陳炯明在粤主政，還沒有叛變，約仲甫去粤，擔任廣東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所以代表大會，他不能親來主持。廣東代表是公博，北京是張國燾，劉仁靜，長沙是毛澤東和一位姓何的老先生，漢口是陳潭秋，包惠僧，上海是李達，李漢俊，濟南是誰記不清了。丁默村雖然不是代表，却是C．Y．（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活動份子，也在上海。我便算是日本留學生的代表。其實鹿兒島方面，沒有一個人參加，東京只有

一個施存統。我算是代表施和我自己兩人。第三國際，加派了馬令來做最高代表。我和毛澤東等三四人，住在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學樓上。當時學生放了暑假，所以我們租住。沒有床，我們都在樓板上打地舖。伙食，當然是吃包飯。在貝勒路李漢俊家，每晚開會。馬令和吳庭斯基也出席。開到第四晚時，究竟是馬令有經驗，他說：『明晚一定要換個地方。我們在此一連開了幾晚會，一定使巡捕注意。』我們說反正明天只有一晚，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於是決定仍在原地。那天下午，我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一個人睡在地板上想工作進行的步驟，糊糊塗塗也就睡着了。大約十二時左右，忽然醒來，看見毛澤東探頭探腦進房來，輕輕的問我道：『這裏沒有發生問題嗎？』我駭了一驚，問他，纔知道是出了事。

原來他們正在開會的時候，忽然有一個面生的人跑進房來，因爲當時既沒有衛兵守門，而漢俊家又是和同鄉合住。所以此人上樓，沒有人去阻止。他進房來一看，便道：『對不起，走錯了。』說完，立即退回。究竟是馬令機警，他說：『快散了罷，一定是偵

探。」於是立即散會，只有公博還留着與漢俊閒談。不到一刻鐘，法國探目，安南巡捕，中國包打聽，把房子圍住，一湧上樓。探捕問他們為甚麼開會，他們說大家都是北大學生，因為要出一種雜誌和叢書，所以開會商議。探捕又問為甚麼有兩個外國人。他們說兩人是北大教授，請他們指導。一個中國探捕指着公博道：『你不是日本人嗎—？原來公博雖然自信他的北京話，說得和北京人一樣，而別人聽起來，却好像是外國人說中國話。所以硬指他是日本人。經了好久的說明，纔證明他是廣東人。巡捕看見漢俊書架上，全是社會主義的書，於是大教訓一頓，說不應看這些書。鬧了一刻，也就去了。僥倖巡捕沒有搜身。他們兩人衣袋內，都放有共產黨黨綱草案，如果搜出，還有不進巡捕房的道理！公博當時帶着新婚夫人度蜜月，住在大東旅社。巡捕走後，他怕有人跟梢，不敢逕回旅館，繞了幾個遊藝場，纔回旅館。那知他緊隔壁的房中，當晚發生一件奸殺案，開了兩鎗，打死了一個女人。公博夫婦，真嚇得魂不附體。毛澤東以為博文女校，也一定被發現了，嚇得不敢回去。在遠遠的地方，探頭探腦偵察了半天，纔敢進去。這些話，都是我以後聽見他

們說的。

我聽了毛澤東的報告以後，覺得功虧一簣，實在可惜，和他商量明日一定繼續開會，但是上海租界內恐怕不行了。我忽然想起李鶴鳴(達)的夫人是嘉興人，何不去嘉興開會。於是便力疾跑到漁陽里去商量，因爲鶴鳴住在仲甫家裏的。我們商量決定，鶴鳴夫人明日早車赴嘉興，先雇一隻大船等着，我們第一班車去，乘船遊南湖。於是連夜分頭通知各人。到了第二天，三三兩兩的到北站上車，我也抱病前往。到了嘉興，早有鶴鳴夫人在站等候，率我們上船。當地的人，以爲是遊南湖的，也不注意。我們把船開到湖中，忽然大雨滂沱。我們就在船上開起會來，通過黨綱和黨的組織，並選舉陳仲甫爲委員長，我爲副委員長，張國燾爲組織部長，李鶴鳴爲宣傳部長，仲甫未到滬的時期內，由我代理。「中國共產黨」，就這樣在煙雨蒼茫，湖波浩渺的孤舟中，正式產生了。當時我們對於這個黨，是懷着滿腔希望，而且舉全副精力去奮鬭的。那知道以後參加了惡劣的份子，越變越壞，竟變成殺人放火，屠城洗寨的流匪，和張獻忠，李自成一樣的殘忍。所以當時第一次

全國代表的人物，大部都先後宣告脫黨。公博回粵不久，就赴美留學，無形的退黨了。李漢俊，李鶴鳴和我，在十三年前後，都先後脫離了。劉仁靜被開除變爲托派了。我們當時的最高領袖陳仲甫（獨秀），在十八九年的時候，也脫離了。張國燾在國民黨與勦共之師後，在鄂東還活躍了許久，但是二十六年也脫離了，現在在重慶，和陳立夫一起，做反共的工作。我以後二十六年秋，和仲甫在南京見面，二十七年春，在漢口和國燾見面，回憶前塵，都有隔世之感。我們發起共產黨的時候，做夢也沒有想到會惡化到變成流匪。作俑的人，實在是罪孽深重！

大會完畢之後，一面指派各地的負責人，分頭前往工作，一面在上海活動起來。我們覺得實際工作，要從勞動運動做起。於是便成立了一個『勞動組合書記部』，以發動並指揮上海勞工運動。『勞動組合』是日本名詞。『書記部』是俄國名詞的翻譯。把一個日本名詞和一個俄國名詞合併起來，做一個勞工運動組織的名詞，是費了許多心思纔想出來的，可見得當時的幼稚了。但是若幹的精神，卻可佩服。例如在日本人經營的紗廠的工

人，想學日本話。我便在工人羣居的地方，開一日語夜校。我自己每隔一夜去教兩小時。『到民間去』的口號，我們都做到了。不僅這件事，當時的經費，是俄國供給的。我和馬令見面，不是在新世界，大世界，便是在永安公司的屋頂花園。在祕密工作正幹得起勁的時候，暑假快完了，我不能不回到學校去上課，所以迭電催促仲甫來滬，以便交代工作，再去鹿兒島。仲甫果然辭了廣東職務，到上海來了。誰知他到上海之後，突然發生了一件意外事件。

現在記不清了，不知為一件甚麼事，仲甫和馬令，雖然沒有見面，意見却不一致。仲甫是一條硬漢，一定要馬令認錯，纔肯見面。而馬令却不肯認錯。正在這樣相持的時候，有天我在仲甫家商量妥協方法，却被仲甫夫人拉着打牌。滑稽極了，仲甫夫人，楊明齋（俄國回來的山東人）和我三個人，打起麻將來了。仲甫和力子，在樓上談話。忽然包惠僧跑來說：『我剛從輔德里來，路上遇見密斯楊到你那裏去了。』原來我的祕密住處，在南成都路輔德里，我那時正和淑慧戀愛着，是鶴鳴夫人介紹的。聽了惠僧的話，我就把牌讓

給他打，回到輔德里，淑慧正在等着，我便約她到法國公園去散步。經過漁陽里，她要去看仲甫夫人，被我阻止了。公園散步之後，我送她回家，順道去看馬命，他託我帶一封信給仲甫，說把第三國際代表的頭銜拿出來，信中對仲甫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我帶着這封信再到漁陽里，已是黃昏時候了。敲開了後門，忽然一個山東大漢問道：『你找誰？』我說：『找陳先生。』他說：『不在家。』我立即覺得很奇怪，馬上退出。我想仲甫家裏沒有這樣的人，何以這樣兇？回到輔德里不久，陳望道神色倉皇的走來說：『仲甫、力子、惠僧、明齋、和仲甫夫人，都被捉到巡捕房去了。你這裏一定很危險，趕快把重要文件燒掉，去躲避一下。』我聞訊之後，非常驚異。後來聽見大家說起，纔知道原委。原來我走後半點鐘，巡捕來包圍，把一切人都捉去。惠僧做了我的替身，他不來報告密斯楊的事，當然被捉的是我，決不是他。經過漁陽里時，如果聽淑慧的話，去看仲甫夫人，我和淑慧，也都要被捉。這兩關，我都逃過了。巧不巧呢？這還不算危險，還有危險的事。原來仲甫到了巡捕房，不承他自己是陳獨秀。巡捕房

以爲沒有捉到陳獨秀，所以命令把守他的房子的包打探，不論是誰，凡到陳宅去的，都要捉去。湊巧褚輔成去訪仲甫，包打探不問靑紅皂白，把褚也捉去了。褚到了巡捕房，上級人員是認得他的，問他何事到陳宅去，他當然說是訪陳，又問他是否認得陳獨秀。他說不認得怎麼去看他。捕房人員說帶他去看。於是帶他到拘留的地方。仲甫看見褚，正要打手勢叫他不要指出，而褚却先大聲喊道：『仲甫，這是怎樣一回事！』於是事情弄穿了。捕房遂通知把守陳宅的包打探說，陳獨秀已經捉到，以後來的人不要再捉了。我正是包打探接得通知之後，纔去送信的，否則，一定也要被捉去。身上搜出第三國際代表的公文，眞贓實犯，還有不判幾年徒刑的嗎？這些話，也都是以後大家出來，對我說的。我逃脫這第三關，眞是大家之福。不然，一干人都要監禁幾年。力子和仲甫夫人，當晚就保釋了。但是營救仲甫却很費事。正在這個時候，又發生一件重要的事。

原來民國十年，美國召開華盛頓會議。第三國際，認爲這是宰割弱小民族的會議，所以在伊爾庫茨克召集了一個遠東弱小民族會議，以謀抵抗。中國方面，要召集工人，農

民，商人和青年的代表六七十人，派去出席。時間非常倉促，而又毫無準備，急得我毫無辦法。商量數次，以廣州爲中心的南方各大都市，和以北京爲中心的北方各都市，都派人去召集，長江一帶，由我親自出馬。於是把營救仲甫的事，托付力子等人，乘直航長沙的輪船逕赴長沙。

渡日的時候，由長沙到上海，所坐的船，不僅不是統艙，而且連四等艙都不如，是坐臥在運滬的米袋上的。這一次因爲掩護起見，坐了官艙。第一次吃飯的時候，五六個茶房，站在周圍侍候盛飯，我坐着非常不安，因爲我這還是第一次經驗。我覺得同是一個人，爲甚麼我們可以坐着吃飯，他們却要立着伺候？但是過了兩三天，也就習慣了，不覺得甚麼不安。可見得一個人眞誠而純潔的靈魂，是容易墮落的。不過尊重人道的基本觀念，我還是非常濃厚的。跟隨我的副官們，不是做錯了事，我決不隨便責罵，對於其他的屬下，更不必說。但是偏有人說我是官僚，架子大。這眞是天大的寃枉。有許多人我不能接見，實在沒有時間。我的時間，是要用在最有效的工作方面，那裏能夠用去聽別人背履歷，發

牢騷呢？時間實在不夠支配，連星期日都要會客，辦事，敷衍不周到，自然是必有的事，那裏是架子大？也許我的環境使人看起我來好像是官僚，其實我的書生本色，始終絲毫沒有改變。誤會的事，實在很多。去年由日返國，經上海坐夜車到南京，天氣又冷又早，我萬想不到會有人在車站接我。下車一看，車前站着財政部和中儲的高級同事。我以爲只有少數人，所以點頭致謝外，就出了車站。以後有人告訴我，當時去接的，還有社運會等機關的許多人，看我沒有和他們打招呼，事後罵我架子太大。其實我那裏知道有這許多人去接呢？這些事不必解釋，也不必求人諒解。不過寫到此地，不覺自然而然的順筆寫起來。言歸正傳，離題出軌的話，不要再多說了。

到了長沙，住在當時有名的大吉祥旅館。連夜去看毛澤東。他那時在曾公祠辦了個自治大學。沒有教授，也不上課，而名之爲大學，可見得五四運動後當時文化界之混亂了。他就住在校內。我進去後，遠遠看見他在燈下看書，原來是用紅筆圈李後主的詞。他看見我忽然到來。駭了一跳。我告訴了原委，便連夜商量辦法。三天之內，召集了二十餘人。

當然大部分是青年學生，農民一個沒有，工人却有兩三個。我分別見面，指定了集合的日期和地點，並分發川資後，就離開了長沙。當時軍閥雖然沒有特務工作，也沒有藍衣社，但是却也有他的偵緝隊，不過不大靈敏罷了。我上了船走了半天，趙恆惕纔派人到大吉祥去搜査。去年決心回家省母，而道路不通，今年到了長沙而不能回家，世界上的事，眞是不由人算！不單是不能回家，而且因爲秘密工作，連信也不好由長沙發，只好惘惘悵悵，離開長沙。

到了漢口，便去武昌尋陳潭秋，他在一個中學當教員。和他商量，在兩日之內，約集了十餘人。閑時和他去遊黃鶴樓，望着長江景色，眞是『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照例和各人分別談話後，於是隨流而下，到了安慶。這個地方，沒有熟人。在上海時，老早托高語罕介紹了兩個人，於是拿着信去尋。但是這兩人並非黨員，而安慶也沒有黨員，所以比較費事。他們約我遊菱湖公園和臨江寺，一面遊玩，一面說明，住了兩天，好不容易纔集了五六個人。於是又以安慶兩個新友的介紹，到蕪湖赭山的第五中學去訪一

位學生。在此地也約了二三人。經過南京，並不勾留，一直回到上海。這次派赴伊爾庫茨克開會的青年，以後大部都到莫斯科去留學。後來共產黨的新興幹部，一部就是這一批先生們，一部乃是法國回來的勤工儉學的學生。這兩部分人，在共產黨內，磨擦得很厲害，而其勢力，也互爲消長。這是後話。

到了上海的時候，仲甫已經出獄，並和馬令見面了。學校早已開學，我便把經手的事，交給仲甫，偕淑慧渡洋，到鹿兒島去了。去年看報知道仲甫在四川江津逝世，回憶故人，悽愴欲絕。

我在上海和長江一帶活躍的情形，鹿兒島的中國同學，都不知道，而日本警察却知道了。到了鹿兒島後，他們暗中對我，非常監視。我的導師門脇先生也警告我，要我注意，否則，有被開除學籍的可能。於是我便老老實實的用功，好在在鹿兒島也沒有活動的餘地。

日本高等學校每年兩次的學期考試，是非常嚴格的。不單是中國留學生留級的很多，日本的同學，留級的也不少。甚至有留兩三年的。一位山西同學，和我同住，每一年

級，必留一次，人家只要三年，他却讀了六年。很佩服他有毅力，終於畢了業。我是很怕考試的。因爲平常課外的閱讀和譯作，佔了我許多時間，學校的功課，除却西洋史一類自己愛好的，和英文德文一類每日要繳卷的東西以外，平日是睬也不睬的，一定要到考前一兩週，纔臨時抱佛脚去連夜趕看。考試的關頭，眞不易過，就是現在，還常常做夢，夢見考期快到，而許多東西，還沒有看，心中着急，急醒過來，原來是夢。可見得考試給予我的印象的深刻了。但是僥倖我一次都沒有留級，很順利的畢業了第七高等學校。

鹿兒島實在可以留戀，櫻島朝霞，磯濱夕照，時常在我夢中。四年來，屢次經過福岡，飛往東京，總想到鹿兒島去重遊名勝，再訪母校，因爲時間的關係，終不可得。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設法，以償宿願。

究竟進東京帝大或京都帝大，費了不少的考慮。當時有名的馬克斯主義的權威者河上肇先生任京大教授，我因爲要進一步研究馬克斯主義。所以便入了京大。當我偕淑慧甫抵京都車站的時候，便服警察，就迎上前來，問我是否周某。因爲我從鹿兒島動身的時候，

那裏的警察，早已電京都報告了。我們在學校後面的吉田町，租了牧田家的樓上兩間屋子住起來，自己開伙食。當時大學生的宿費，是每月七十二圓。兩夫婦每月用七十二圓，自然拮据得很，所以不用下女，一切買菜、燒飯、洗衣，都由淑慧自任。有時宿費沒有寄到。便把衣服或書籍，拿到當裏去當。起初去當，倒有些難爲情，以後也無所謂了。

當時先生，除却河上肇外，我最愛聽以後曾任商工大臣和鐵道大臣的小川鄉太郎的財政學，小川口如懸河，像個政治家。河上一副冷靜的面孔，嚴肅的聲調，眞可以領導人走上冷靜研究的道路。在大學時期，我每日是過的圖書館生活，連午飯都是帶乾糧去吃。只是晚飯後，或偕淑慧到附近田野間去散步，或一個人去跑舊書店。有了好電影，一定去看，但是都是一個人去。因爲一則由吉田町到電影區的京極，相當的遠，我來往都是步行。二則當然買的是最低的等級，常常沒有座位，要立着看。當時日本放映時間很長，一立就要立三四個鐘頭。有時站得太吃力，只好蹲着休息。我是電影迷，情願吃這樣的苦。淑慧自然不會這樣。所以大概是我一個人去。在京都也組織了一個講演會，每週練習講

演。有次我的演題。是『資本是甚麼』？本着馬克斯主義的立場，說明資本的本質，發生和發展，深得同學的好評。現在囘想起來，當時情形，猶歷歷在目。

幼海是京都出世的，當時窮的要命，淑慧生產的時候，當然不能進醫院。生產的那天，恰好大雨，牧田老太太連夜於大雨中去接產婆，以後時常幫忙淑慧，撫養小孩。她這樣的熱心，我們非常感激。前年淑慧赴日，特地到京都託警察查了出來，前去拜訪。我由東京返國，經過京都時，也去看了她。事隔二十年，我們還特地去訪問，日本報紙對我們這樣的念舊情殷，都非常讚響，

多了一個小孩子，事情就多得多。有時我正苦心焦思，研究一個理論的時候，小孩大聲啼哭，眞是心煩。淑慧除燒飯，洗衣外，又加上撫養小孩的事，生產之後，不到四天，就起來燒飯，可見得當時的艱苦了。有次我去上課，她去買菜，把小孩一人放在房中，忽然房中席子，着起火來，剛好那時她囘來，已經滿房都是煙，小孩悶得氣都閉塞了。如果她遲囘去十分鐘，房子就會燒掉，小孩也要葬身火窟了。這也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

沒有考進學校，非常焦慮；學校快畢業，卻又非常恐慌。沒有進學校，不能領官費，飯都沒有吃，那裏能讀書？畢業離開學校，官費不能再領了；如果找不到職業，飯都沒有吃，那裏能革命？那怕你志氣比天還高，那怕你野心比海還大，不能生活，甚麼都是空的。志氣不能充飢，野心不能禦寒！咳！生活，生活，這兩個字，古往今來，不知埋沒了多少英雄豪傑，志士仁人！我當時有兩個打算：第一，最理想的是做北京大學的教授。因爲五四運動，新文化運動以來，北大很出鋒頭。陳仲甫，李守常也都是那裏的教授。做了北大教授，地位既可以號召，也有相當的虛榮。但是唯其如此，北大教授，是不容易到手的。想的人既多，而當時北大學閥的門，又關得相當的緊；那裏能夠如願？第二，不得已而思其次，想到上海商務印書館當編輯。看見很多留日同學，在那裏任編輯。薪水最多的，每月是一百五十元。我想如果能得到每月一百五十元，也可心滿意足了。但是談何容易！商務的編輯，雖然沒有北大教授那樣困難，但是也不容易到手。到政府機關去運動一官半職，既然不是我的志願，也不是一個共產黨黨員所應爲。這件事情，雖然用盡心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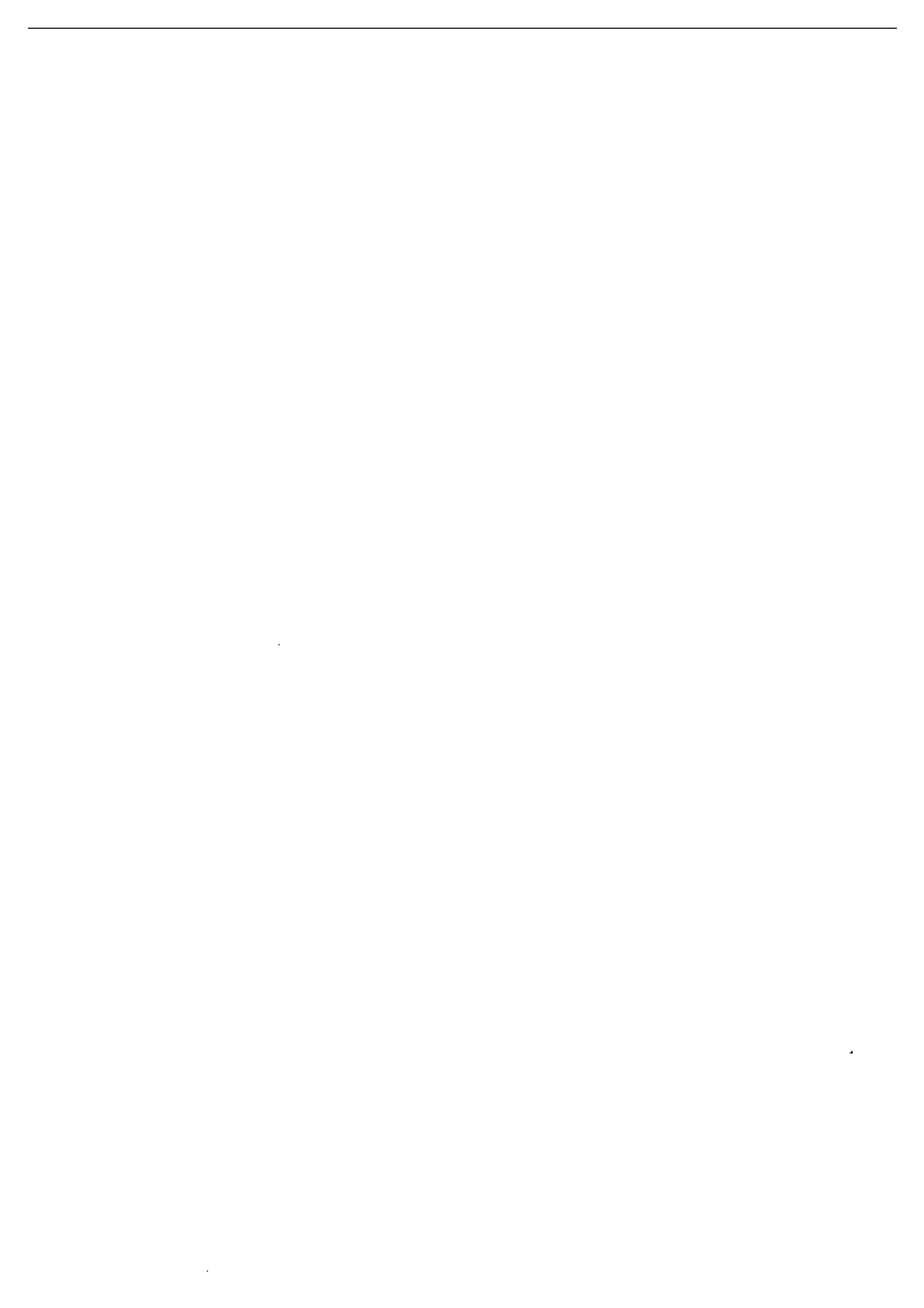
沒有辦法，但是却從天外飛來一個意外的機會，很輕鬆的把這個問題解決了。

原來國共正式合作，國民黨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許多共產黨都加入了國民黨。這就是所謂跨黨份子。我當時雖然還沒有正式加入國民黨，但是戴季陶先生，却約我去廣東幫忙。他當時任宣傳部長，要我任祕書，每月薪水大洋二百元。（當時廣東，都用毫洋。）後來到了廣州，鄒海濱（魯）又要我兼任廣東大學教授。別的教授，每月只有毫洋二百二十元，而對我却送大洋二百四十元。當時要求一個每月一百五十元的商務編輯都不可得，現在每月却有四百多元的收入。加之那時廣東，革命空氣，非常濃厚，革命工作，非常緊張，事事都表現前進向上的蓬勃氣象。所以我由學校一出來，就得了這樣的地位和工作環境，實在是始料所不及。但是這些都是後話，當在學校還沒有找得職業出路的時候，實在焦急萬狀。我想快要畢業的無數青年，沒有一個不是這樣情形的。大家不要着急！『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預先播下了『努力』的種子，雖然一時覺得山窮水盡，終究會出現柳暗花明的境界的。

我不是道學先生，也不願意學道學先生。老實說，我秉性也不許我怎樣拘謹。回國以後，也曾有過不少的放誕行爲，浪漫事實，但是在留學的八年之中，却眞正過的是淸教徒的生活。不單是沒有一件足以稱爲『羅曼史』的豔遇，連狎遊也沒有嘗過一次。現在可以囘憶的只有一件平淡無奇的事，我是愛吃酒的，量雖不大，興致却豪。在到鹿兒島的第一年，有一晚和同學痛飲，大醉而歸。不知道如何於歸途中倒臥在路傍。我當時住在城山後面一個僻靜地方，叫城谷，往來的人，非常之少。彷彿有位妙齡女郎，扶我起來，而且扶送我囘家。我進了『玄關』（大門）馬上又倒在蓆上，只說一聲『謝謝』，也沒有看淸這位女郎的面貌，更沒有問她的姓名。次日酒醒，也就忘了。兩三日後，在赴學校的途中，遇見一個女學生，向我微笑，我以爲是偶然，也不注意。不久，又遇着，仍是微笑，並且好像要和我說話一樣。我以爲是認錯了人，但是覺得非常奇怪。第三次又遇着了。本來想問她一句，不過當時臉薄得很，和女人說話，臉就要紅。我們用了一個老太婆管家，她有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兒帶來同住，也生得相當秀麗。我和她說話的時候，眼睛總不敢對她

看。就是現在和初次見面的女人說話，也覺得非常不自然。所以當時雖然要向那位小姐談話，眞是欲言而止者再。倒是她走近來先開口道：「那天晚上，你的酒，吃得眞太多了。」我恍然大悟，回想起那晚扶我的女郎。以後便常常遇見，因爲我們學校的對門，是一所高等女子學校。她到學校去上課，常常途中相遇。路上沒有人的時候，我們都常常談話，而且越談越親密。但是我却沒有問她的住址，當然沒有去拜訪她。如果進一步的追求，當然大有成爲眞正羅曼史的可能，但我却就此中止了。這便是我留日八年，唯一無二的夠不上算豔遇的豔遇。

往事如煙，前塵似夢，一一追溯起來，倍覺光陰虛度，老大徒傷。二十年來，經歷了事業的艱難，體驗了世途的險阻，當年的抱負，昔日的野心，好像過去的事實，如夢一般的消逝了一樣，也如煙一般消逝了。今後只希望盡自己一點微力，俾能對於國家和人民，略有涓埃的貢獻，以了此殘生，其他還有甚麼冀求呢？



盛衰閱盡話滄桑

祇要把從古到今的歷史，翻閱一遍，任何人都會感覺世事無常，人生靡定，而有盛衰興亡之感。不過在紙面上閱讀所生的感覺，決沒有由實際經歷而發生的那樣痛切，那樣深刻。『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這類的滄桑之感，不是親身經歷，決不會體念出其中所含的無限變幻莫測的凄涼酸辛的味道。

我年齡不過四十餘歲，參加政治生活，也不過十六七年，所親自經歷的事情，較之幾朝遺老，革命先輩，當然要少得多，配不上說閱盡興亡，歷盡盛衰。不過自從中華民國成立，至今三十一年，在這個短短的時期之中所發生的盛衰升沉的事實，實在比昇平時代一百年中所發生的要多得多！所以浮沉於這個三十一年中的人們，其所遭遇的變化，其所感覺的滄桑，一定比昇平時代的三十一年，要豐富而深刻得多。就我個人說，國民革命時代

以前的變化，例如民初的雨後春筍般的政黨潮流的漲落，洪憲的興亡，以及以後北洋各系軍閥的走馬燈式的離合盛衰，雖然祇在報紙上閱讀，已經令人感覺得白雲蒼狗，變幻無窮了。自從國民革命以後，雖然祇有十九年，却親自經歷過許多突起突滅，時分時合，忽盛忽衰的悲劇和喜劇，令人啼笑皆非，悲喜莫是。在這樣起落不定的澎湃潮流中沉浮了十幾年，焉得不令人感覺得個人的事，無一不是空的，而發生消極之思呢？成固不足喜，敗亦何必憂。得固不足樂，失又何必悲。榮華富貴，權位利祿，轉眼皆空，何必勞形苦心於這些身外之物追求和爭奪呢！

我是民國十三年五月由日本京都到廣州的。當時　國父任大元帥，正是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共開始正式合作的時候。當時革命基礎，眞是風雨飄搖，談不到穩固。我們且不說廣東省以外的各省，都爲張作霖、吳佩孚、孫傳芳、張宗昌等大軍閥，以及其他許多小軍閥所盤踞；就是廣東省以內，陳炯明割據於東江，鄧本殷虎踞於南路，革命根據地，不過是廣州府屬及北江、西江的二十餘縣；我們且不說革命根據地以外的軍

閥，就是革命根據地以內，那裏能夠統一指揮。當時有粵軍、湘軍、滇軍、桂軍。而最强有力的滇軍，却跋扈異常，桂軍力量雖不大，而作惡却是一樣。干涉行政，把持稅收，包庇煙賭，竟是無惡不作。粵軍湘軍，爲自存計，當然程度稍有差別，辦法也是一樣。而且在廣州，肘腋之下，還有和英國勾結的商團。在這種革命環境之中，當時誰也做夢都想不到四年之後，革命軍可以直搗幽燕，完成北伐，使國民黨統一中國。從十三年下半年到十四年年底一年半的時間內，咆哮的商團解决了，跋扈的滇桂軍消滅了，負嵎的陳鄧驅除了。當時氣燄薰天，炙手可熱的反革命和假革命的軍政巨頭，一個個抱頭鼠竄的亡命去了。革命政府，改爲國民政府，於七月一日成立了。在國民革命，固然是初步成功，在他們個人，何嘗不是從極得意的地位，變成極失意的情形？何嘗不是從有權力地位，變成了黃粱一夢！這些經過，我都親自經歷，有些而且參加的。在我們成功者歡欣鼓舞的一方面，正反映着別方面失敗者的垂頭喪氣。

正在這個時候的前後，本黨的領袖之間，因爲廖仲凱先生被暗殺一案爲發端，發生了

極劇急，極激烈的分離和排斥的運動。外患甫平，內憂突起。十四年下半年至十五年上半年之交，黨內各領袖間關係變化之劇烈，眞令人目眩神迷。其中經過，不必詳敍，但是當時却不能不令我發生世變莫測的深刻的感慨。

十五年七月北伐了。當時對北伐的前途，誰也沒有絲毫把握。北伐軍隊，不過是七湊八湊而成的七八萬人。無論在數量方面或質量方面，都趕不及盤踞長江上游的吳佩孚及盤踞長江中下游的孫傳芳的軍隊。（張作霖的軍隊，還不在內。當時的策略，是攻吳聯孫不理張。）但是精神的力量，竟克服了物質的缺憾，經過汀泗橋賀勝橋兩役，革命軍竟如摧枯拉朽的佔據了漢陽和漢口。武昌圍攻了一月，在十五年雙十節那天進了城。當時總政治部在漢口的小同志，精神奮發，分乘着汽車赴漢口市各地去發傳單。我也很高興的坐着一輛汽車伴着他們去宣傳。城破之後，總司令行營，便搬進了武昌的『督署』。我奉命爲行營祕書，襄助行營主任鄧演達。叱咤風雲，睥睨一世的吳大帥，竟這樣輕易的打倒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武漢陡然產生了許多新貴，同時另一方面，當然又產生了大批失意的政

客和官僚。不久，九江、南昌相繼佔領了。武漢形勢，越加鞏固，而孫傳芳却敗走南京城。從十五年秋，到十六年秋，不僅長江方面，革命勢力日益發展，因為馮玉祥師出潼關，革命軍攻出武勝關，以及奉軍南下與革命軍對壘，整個北方的局勢，也發生極大的動搖和變化；就是本黨的內部，也發生了極大的分化。隨着革命勢力的發展，國共的磨擦，黨內的糾紛，也同時激盪的發展而尖銳化。

當時我奉命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校長是蔣先生。鄧演達代理校長，張文白（治中）為教育長。鄧的兼職很多，張也兼學兵團團長，另外在湖南訓練三四千人。所以學校的事，大半由我主持。當時最痛苦的，就是應付國共的磨擦。我已於十三年冬在廣州脫離了共產黨，所以共產黨對我，自然是對立的。同時國民黨的右派，却認我仍然帶有紅色，時加以監視和牽制。當時工兵隊和礮兵隊的學生，是從黃埔調來的，步兵學生二千餘人，則是在武漢新招的。我是學生招齊了之後，纔被調到學校，所以新招的學生，三分之二是共產份子。十六年一月蔣先生由南昌到漢口，有一晚我深夜去看他，把學

生份子複雜的情形報告他，他雖然要我切實的監視，但是也沒有具體辦法。記得當晚去訪的，還有當時被共產黨壓得氣都透不出來的葉楚傖。他也是祕密的去談國共的問題的。

革命勢力既已發展，國民政府當然不能蟄居廣州一隅，而要遷移了。當時本決定遷移武漢，而蔣先生因為武漢幾全為共產黨所支配，而且唐生智也另有打算，所以主張暫遷南昌。為了這個問題，不單是國共之間，爭鬪激烈，黨的內部，也非常糾紛。結果，還是遷到武漢。蔣在武漢不過幾天，就回南昌，準備攻略南京。當時共黨對我和文白，更加嚴密監視。蔣於南昌出發之前，曾三電文白，叫他帶着學兵團赴安慶待命，作為總預備隊。三電沒有得覆，遂打電來問我。我去詢文白，纔知道當時文白的往來電報都被扣留了。我遂回了一電，究竟接得與否，以後也沒有去查。但是因此共黨對我監視越加厲害，請鄧演達派了有名的共黨惲代英來做總政治教官，實際上執行政治部主任的職務。我常稱病不到學校，惲常打電話到我家，明為商量事務，事實就是偵察。我一接電話，便裝作咳嗽，他便笑說：『不要從電話中把傷風傳給我』。文白隨着被迫辭去學兵團長及分校教育長的職

務了。那時我們都有離開武漢的決心。有一晚在漢口的一個小旅館和文白密談，他決定先去，並送我三百元，作爲緊急時的旅費，當時的三百元，値得現在的三萬。所以他的盛情，我至今不忘。文白去後，我時時準備逃走，但是因爲妻兒都在武漢，而輪船碼頭上共產黨的工人糾察隊，稽查更加嚴密，我如被發現逃走，不待說是處死刑。因爲當時的糾察隊，是可以隨便殺人的。

在這個時候，革命軍佔據了上海、南京，不僅孫傳芳打得棄甲曳兵而走，張宗昌的援軍，也如秋風掃落葉似的，趕回山東去了。於是國民革命軍遂奠定了長江流域。

南京克復之後不久，就是十六年四月，南京又成立了一個國民政府，和武漢的國民政府，遙相對峙。

我那時在武漢脫身不得，正在百計圖逃的時候，四月下旬，忽然夏斗寅的軍隊，舉起反共的旗幟，由宜昌東下，直迫武昌。那時第四第八等主要的軍隊，已開往河南，武昌沒有有力的軍隊，足以抵抗夏軍。於是把我們學校幾千學生，編爲一個獨立師，開出去打

仗。當時如果要我一同出發，那就會永久不能脫身。僥倖他們不要我去，惲代英以代理政治部主任名義，隨軍出發，我仍留校留守。那時因夏軍逼近，共產黨也深爲恐慌，以全力集中去應付，稽查得沒有那樣嚴密了。我想此時不走，更待何時？於是在漢口法租界開一個小旅館，妻兒以看戲洗澡爲名，過江住在旅館，好在沒有甚麼貴重物品，不過幾件隨身衣服，也很容易陸續運過江，正在這個時候，我們的老友陶希聖忽來談；我便告他我要走了，並勸他也走。他說隨身只是軍裝，沒有便服，不易逃脫。我太太淑慧，就把我的長衫短褂送了他一套。誰知以後他竟沒有走，竟做了學生改編而成的獨立師的軍法處長，被逼殺了不少的國民黨同志。以後武漢分共的時候，還隨着這個隊伍跑到南昌。一直到葉挺賀龍等共產黨在南昌暴動的時候，纔能脫身。可見遇緊急關頭，如果不當機立斷，沒有不貽誤的。不過他沒有把我要走的話去告密，這還算是夠朋友的。這些閑話，不必多提。

那時我岳父也在漢口，他認識太古洋行黃浦輪船的買辦，和這位買辦商量好，在清晨六時左右，由他接我上船，住在買辦房中，以後妻兒陸續也上了船。一上了船，我便安心

了。因為那時漢口英租界雖然收回，英帝國主義，仍有餘威，共產黨無論如何猖獗，還不致上船搜查。於是就如此這般的於五月初間離開了漢口。以後聽見說，他們發現我逃脫，立即電九江軍警截留。幸而這隻船在九江沒有靠岸，就此脫出虎口了。

誰知跳出了天羅，卻跌入了地網！世事固然變化莫測，但也不是無緣無故而發生的。前面曾略提過，黨內的右派，還以為我帶有紅色，所以我也特別小心，打算先到上海。到上海後，電蔣先生及張文白戴季陶等朋友，然後再到南京。所以船經南京並未上岸。以後船到鎮江略定即開。船開後，買辦神色倉皇到房裏來說，南京派了四個偵探坐火車到鎮江，上了這隻船，說明我在這船上，到了上海，便要逮捕。我深覺事情離奇，百思不得其解。以後纔知道我偶爾到甲板散步，被幾個同樣由武漢逃出的政治工作同志看見了。他們認為我是共產黨，南京上了岸，立即去報告當時總政治訓練部副主任陳真如（銘樞）。（主任是吳稚暉　不管事的。）陳便派人跟踪，並電上海逮捕。這些話都是以後他自己告訴我的。當時便同岳父和淑慧還有幾個同行朋友商量，決定到滬我先上岸，立即分

電各方。他們隨後搬運行李。到了楊樹浦已經是晚上九點多鐘了。岳父送我上岸，叫了一部汽車，看着開車了，他以爲無事，便回船去帶領我的妻兒上岸。誰知車開不到三分鐘，忽來了大批巡捕，把車阻住。有人拿電筒把我一照，就叫我下車，一付手鐐，立卽銬上了我的雙手。我心裏想：『眞的被捕了。』

世界上的事情，眞是離奇滑稽。奉命來捕我的，便是現任內政部長陳人鶴（羣）同志。我在人羣中看見了他，便很高興的高呼：『人鶴！我來了。』他那時也是上命差遣，概不由己，或者以爲我眞是共產黨，所以便假裝沒有聽見走開了。他當時的地位，除此別無他法，也難怪他。我當時便想如何能通一個消息與淑慧；恰巧同行的一個留日同學經過身傍，我便用日語告訴他，我被補了，要他通知淑慧。不久我便和其他五人一併帶到巡捕房。後來聽說當時立卽要把我引渡到楓林橋的特務處去，卽因爲那時已是星期六晚上，第二天又是星期，所以我便在巡捕房關了四天。僥倖有這四天的餘裕，淑慧纔能向各方奔走營救。如果早一兩天引渡過去，那眞是『吾命休矣』。因爲那時殺個把人那裏算一回事。

當晚五個人被送進一間牢獄去，中間已睡了十二三個人，都是蓬頭垢面的，一個個像是惡魔。我當時疲倦萬分，在人縫中擇一個隙地，納頭便睡。次晨星期日，把我們數人帶到另一空房。這一天昏沉沉的過去了，顆粒未曾入口。在那種情形之下，就是甚麼珍饈美味也都不能吃下去，何況是不能下嚥的牢飯！星期一中午時分，有人在門外叫我的名字，我從鐵門上小小的洞口看出去，原來淑慧姑在門口。這個時候，我不禁潸然淚下。原來淑慧接得消息後，急得要死，半晌不省人事。後來精神略定，便去找文白，湊巧他赴杭，遂託其家電杭報告，再去找季陶，而季陶又在南京。當時上海傳說共產黨捉到就殺，淑慧不知我當晚究竟在那裏，一定要查明我的所在地。虧她忽然想起老友郭復初（泰祺）。他那時做着上海特派交涉員。她於是到他原寓去找，却已遷居。深夜一時許坐車到楓林橋交涉使署，纔探到新的地址。再找到新的寓址，復初夫婦，剛剛跳舞回家，適王雪艇（世杰）亦在座。於是他們立卽電話吳稚暉先生，請他卽械楊嘯天（虎）——時做特務處長——營救。但是我究竟在那裏，當晚終未能查出。星期日費了一天的工夫，纔查出我關在楊樹浦

巡捕房。所以星期一特來探監，送一些吃的東西。她告訴我報上已登出我被捕的消息，各方面都已打電報去了，勸我放心。我也安慰了她幾句，斷腸人慰斷腸人，談話不到十五分鐘，便被無情的牢子硬叫她出去了。但是我却因為她的一次探監，精神上得到了無限的安慰，也就安心靜候了。星期二上午坐着囚犯的車子，被帶到第一特區法院出堂，法官倒也客氣，問了幾句，便命回押。淑懿運動就在法院保釋，當時院長是廣東大學同事盧興原，也很幫忙。但是終於星期四被引渡到楓林橋特務處了。

特務處借着一間洋房做臨時牢獄，我進去時中間已有十餘人。這裏的牢飯，比巡捕房的好得多。不過在巡捕房不要銬手鐐，此地却要銬。而且大概因為手鐐不夠的原故，兩個人銬一付。大小便時，固然極不方便，因為一個人大解的時候，一個不要大解的人，硬逼得要立在傍邊等，就是吃飯睡覺的時候，也極不方便。大約兩天之後，文白跑來看我，看見鐵索瑯璫的情形，便上樓和楊嘯天大吵一頓，於是我的手鐐。便因此除下了，雙手自由之後，多了一件差使，就是吃飯的時候，為被銬手不自由的同伴盛飯。坐在內裏的心理，

有時希望外面叫我出去，有時却又怕被叫。因爲同房被叫出去的人，有些雖然仍舊回來，背上却被打得皮破血流。有些一出去就不回來了。這些人中，有些是被釋回家，有些却被送到老家，所以又想被叫，又怕被叫。大約三天之後，門外眞的叫出我的名字了。禍福不可知，吉凶難預料，祇得硬着頭皮出去。却原來是審問。一個年輕的小伙子做法官坐在上面，我因爲眼鏡被取去。近視眼看不淸楚，而孔好像認得，他開口便說：『在廣州我常聽你講演，現在你却要受我審問了。』我聽見了這樣揶揄的腔調，眞是無名火高三千丈，幾乎要罵出來。立卽便想到好漢不吃眼前虧，他雖然是毛頭小子，我現在却是階下囚。於是便『他問一句來我答一聲』。約莫二十分鐘左右，忽然有人送一個條子給法官看。他看了便說：『現在不審了，你太太來看你，你去會她罷！』原來淑慧正在這個時候，要郭復初陪着她見楊嘯天，要求見我。嘯天無法，遂下條停止審問，並要我上樓和淑慧見面。淑慧告訴我當晚赴南京託季陶，因爲當時將赴徐州作戰，南京上海主張殺我的人都很多，陳眞如不敢負責釋放。當時是沒有錢買臥舖的，可憐淑慧晚上坐着三等車來往了幾次，而且有

時沒有坐位，竟站立幾個鐘頭。

這樣糊糊塗塗，在牢裏再住了大約兩個星期。同住十餘人，也不知誰是眞的共產黨，誰是假的。因爲同住一起，也不管並不問誰是眞的，誰是假的。閑着無事，跟同關着的一個人學唱二本虹霓關『見此情不由人心中暗想』那段二六。有一天下午六時左右，外面又叫起我的名字來了。我想一定是前回審我那個小傢伙，閑着無事，又要拿我尋開心。誰知外面叫了我的名字之後。接着說：『把你的衣服帶出來！』我聽了這句話，知道是釋放了。對同住的人，拱手說一聲：『告辭了！』便拿着包裹出來了。出來之後，看見一個副官模樣的軍官，帶着四個帶駁殼槍的兵士，把我的雙手，又鐐銬起來。帶我出了大門，門前早有一部汽車等着。上了汽車，往鄉間直開。越走越荒涼，而且又已夕陽西下。我想來想去，不知到那裏去。釋放嗎？何以不叫我家裏人領去？何以又要銬手？鎗斃嗎？何以叫把衣服帶出來？難道眞的因爲『黃泉無客店』，怕我受寒冷嗎？問那位副官，只回答說：『等歇你會曉得。』弄得我眞是莫名其妙。後來到了南站，纔知道是押解我赴南京。次晨

到了南京，逕送我到戶部街當時的總政治部。當時時間還早，陳眞如沒有來，便押在門房候着。不久來了一位副官，叫把手鐐開了，帶我上樓。眞如一見，便笑容滿面握手說：『對不起，開了你一個玩笑。』我想這個玩笑開得不大不小，幾乎把我的命，都開掉了。談了半天，便說：『今天還在我這裏住一天，休息一下，明天再出去看朋友罷。』於是便叫副官送我到一間房間。當時蔣先生尚在徐州，大約是打電去請示。第二天便把我送到鐵湯池丁公館，交給季陶。鐵湯池丁公館，便是現在的財政部。這也是當時夢想不到的事。和季陶共進了午飯之後，便去旅館訪文白。適淑慧也趕到。夫妻重圓，不禁悲喜交集。這是我生死關頭，所以這一段特別寫得詳細。

蔣先生囘京的時候，我去見他。他劈頭便問我爲甚麼不在南京上岸，惹出這些麻煩。當時南京籌辦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文白被派爲政治部主任，我又被派爲政治總教官。這個時候稍閒，便開始著述『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

十六年六七月以後，武漢的國民政府，發生了變化，南京國民政府，也發生了暗潮。

就是武漢也開始反共，把持一切的鮑羅庭，被送回俄了，這樣的劇變，決不是兩三個月以前所能夢想的。南京則蔣與桂系之間也發生了極激烈的暗潮。當時廣西第七軍，好像是駐在蚌埠一帶。蔣因爲環境所逼，遂不得不於八月下野了。這樣突如其來，天翻地覆的激變，眞令人震動異常。一個連戰連捷的革命軍主帥，在餘敵尙圖掙扎，內部阢隉不寧的時候，忽然棄職下野，革命軍的前途，眞要發生整個的動搖。

在這個驚濤駭浪之中，我當然也跟着到了上海。這一次不能不說是一幕政治上極急激，極劇烈的變動。

蔣先生到日本去了，我仍留在上海。當時季陶已在廣州任中山大學校長，電我赴粵襄助，我於是又到了廣州。這時正是葉挺率着共產軍在南昌暴動後，率部直搗廣州。我到粵不到兩月，看見形勢岌岌可危，便和季陶回滬過陰曆年。我們離粵不久，共產軍便攻入廣州，焚燒屠殺了一場。

回滬之後，知道蔣先生要在上海辦一個刊物，指定季陶、力子、果夫、布雷和我五人

爲委員，並指定我負總責。我們決定名『新生命月刊』。於是風靡一時的新生命月刊，便於十七年一月產生了。（新生命月刊發刊辭係李陶所寫。）

在我在上海辦新生命月刊的時候，南京的局面，是白崇禧和何應欽支持的。桂系和唐生智之間，此時發生了磨擦，桂軍西征，把唐趕走了。唐生智崩潰得這樣快，眞出人意料之外。因爲何鍵當時做安徽主席，安徽也是唐的地盤。兵敗如山倒，這句話眞有道理。於是武漢便成爲桂系的地盤。因此十六年九月，武漢的國民政府搬到南京，和南京的國民政府合併統一了。

蔣先生由日本返國，於十七年一月東山再起，復任總司令，削了何敬之的兵權，調爲總參謀長。把國民革命軍，編爲四個集團，自任總司令，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而以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二三四集團軍總司令。這樣重整陣容，繼續北伐。李白佔據武漢的地盤，另組武漢政治分會，而以程潛爲主席。但是不久程又被李白軟禁去職了。這是後話。

一朝天子一朝臣，我又奉派爲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復理舊業。當時新生命月刊，發展極快，極受各方的歡迎，和當時公博所辦的『革命評論』，並駕齊驅。雖然我們只談理論，『革命評論』兼談實際問題，但是都可以支配並指導當時青年的思想。同時顧孟餘也在上海辦了一種雜誌，名『前進』，却是無聲無臭，毫無影響，當時我又辦了一個新生命書店，出版許多叢書。我的『三民主義的理論體系』，三個月之中，銷售了四萬餘册。在上海正幹得起勁，眞想不到南京去重彈舊調。以後因爲命令旣不可違，友朋又復相勸，所以把新生命月刊，帶到南京來編，重復穿起軍服，掛起皮帶，去過半軍人半文人的生活。

我因爲在學校工作，所以沒有隨軍出發。國民革命軍四個集團，同時並進，孫傳芳張宗昌的殘部不必說，奉軍的主力也擊退了，張作霖出關回奉而被炸了。於是各路的革命軍，就會師於北京，而北伐因以告成。

七月蔣先生要到北京去，文人之中指定力子、布雷、立夫和我隨行，在身邊幫忙。另

外張岳軍（羣）和楊暢卿（永泰）先往，暗中策劃。一行浩浩蕩蕩，受着沿途迎送。先到保定，和白崇禧等前方各路總指揮先行見面，再到北京。我們都隨節駐西山碧雲寺。當時國父靈寢，仍在西山，遂舉行祭靈大典，報告北伐完成。記得讀祭文的，是當時第三集團軍之下的總指揮商震，一口北京口音，聲調抑揚，很能動人。當時不僅四個集團軍總司令，就是各路總指揮，也都齊集北京。濟濟一堂，眞是極一時之盛。大家興致之高，意氣之豪，眞是不可一世。當時東北易幟，接洽將成，從此化干戈爲玉帛，易割據爲統一，中國前途，眞有無窮的希望和光明。我當時雖然是一個跑龍套的角色，但是親歷其境，這個盛況，畢生不忘。現在回想起來，眞是萬感交集！

當時集議之下，定了編遣計劃，接着召集編遣委員會，誰知以後的反覆內戰，却由這個編遣計劃而種下了惡因。這是後話，不必去說。

隨節回京以後，因爲種種關係，仍想去上海專辦宣傳文化工作，託果夫壓爲婉言，好容易得了許可。於是於十月辭去軍校職務，回到上海。在這個時期之內，武漢和南京的關

係，日漸惡化，將潮漸漸高漲，終於澎湃爲不可遏止的戰潮了。

彷彿是十八年的二月間，蔣先生到了上海，我去看他。他說：『你還是到南京去幫忙，就去。』到了南京，要我搬進總司令部，於是就住在力子隔壁的房間，就是現在三元巷警官學校的前樓。前年兼任警政部長，到警官學校去視察的時候，在這個房中徘徊許久，感慨橫生。這時正在召集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滑稽得很，我被指派爲非律濱的黨員代表。那時也不知道是因爲甚麼原因，大部青年同志，對胡漢民先生感情都不甚好。在開會的時候，大鬧一場，我和段錫朋、洪陸東、蕭錚、何思源等十餘人，當場退席，再不出席了。以後纔知道這次我若不退席，可以當選爲中委，因爲名單早已祕密擬好了。當時胡先生還疑心是蔣先生，至少，是果夫叫我們幹的，和他爲難。其實這是寃枉，完全是我們十幾個靑年同志自動幹的。因爲當時蔣先生對武漢將有所舉動，要運用代表大會授權給他，處理緊急事變，怎樣會叫人搗亂大會。

有天晚上，蔣先生親自打電話給我說：『請你馬上到公館來一下。』那時他的公館就

在總司令部之後，內裏是可通的。他叫我草擬一篇討伐李白的宣言，並口授李白種種背信和不法的事實和要加以討伐的理由。我心裏暗想，眞的要幹起來了。

前方已接觸起來了，大約是十八年三月，我奉命隨同出發，隨節坐着楚有軍艦上駛。當時有兩個幕後人物，文的仍是楊暢卿，武的便是廣西軍人前輩俞作柏，他們另外坐一隻被徵發的招商局的船隨後跟上。因爲運用俞作柏的關係，桂軍裏面最有力的兩個師長李明瑞和楊騰輝，早已和中央發生了關係。等到中央軍進了湖北境，桂軍這兩部有力部隊，忽然宣佈擁護中央。發生了這樣意外的變化，李白自然不能不退出武漢了。彷彿我們出發以後不到一個月，桂系在武漢的勢力便崩潰了。楚有軍艦停泊在漢口下游五十餘里的江中，看見上面駛來一隻小火輪，乃是民衆團體的代表來歡迎。我代表接見，並發表簡單的談話。於是楚有軍艦，便逕駛到漢口。這次桂系崩潰得這樣快，沒有大規模的戰爭，就解決了武漢問題，也是出人意料之外。

到漢口不久，便奉命爲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處長，兼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於是又

穿起軍衣，掛起皮帶了。

舊地重遊，回想十六年脫出武漢的情形，眞有隔世之感。自從我離開武漢之後，武漢的局面，經過了好幾次的大變化。由共產黨猖獗，演變成武漢淸共，由淸共而變成唐生智獨裁。唐生智崩潰，繼之以桂系當權。現在又變一個局面了。在這短短的兩年之中，在這小小的區域之內，就發生這許多次人事升沉，派系盛衰的現象。政潮的起伏，個人的得失，那裏能夠預料，那裏可以認眞！

兩湖奠定之後，便隨節回了南京。正在這時前後，第二幕的活劇，又將醞釀成功了。蔣馮之間，隔膜日甚一日，暗潮也一天一天的高漲起來。五月以後，愈加決裂。看見兩人來往電報，打筆墨官司，就知道不久也要兵戎相見了。雙方都調兵遣將，劍拔弩張，準備大戰。但是馮以退爲進，表面上，於五月底通電下野，以閻之邀約，赴山西晉祠；閻同時也請陪馮出洋。這不知玩的是甚麽把戲，大約是消極抵制。因此蔣於八月再到北京一次，這次我也同行，同行的還有陳布雷、孔祥熙、趙戴文、熊式輝等，一路談談笑笑，很

覺愉快。這次大家都同住北京飯店。閻來北京會談，蔣勸閻不必出洋，但必須令馮出洋。閻因之稱病入德國醫院，謝絕見客。我們住了一個多禮拜，便回南京。

蔣先生手法異巧妙，早已和馮部下有力部隊韓復榘、石友三有了接洽，韓石忽於此時通電擁護中央。同時起用了唐生智，叫他到天津集合因北伐留在京津一帶的湘軍，進駐鄭州。十月十日，西北將領通電討蔣，第一次蔣馮戰爭從此開幕了。

在武人磨槍擦刀的時候，我們拿筆桿的同志，就忙着草擬通電、宣言和宣傳大綱。唐生智以前敵總指揮的名義，指揮隊伍，在黑石關和登封、臨汝一帶和馮軍開火之後，我於十一月初又奉命隨節出發了。先坐船到漢口，再乘車到許昌。總司令部，即設在火車上。唐生智到許昌來了。兩年多不見，他已是升而沉，由沉復升，翻了幾個觔斗了。當時韓復榘、石友三、何雪竹（成濬）等，都集合許昌。會商後，唐便出發到黑石關去督師了。經過了幾次激戰，馮軍節節敗退，戰局已具有了決定性，不難結束。而其他方面的複雜變化，卻非到南京去處理和應付不可。所以唐生智便奉命代行總司令職權，全權處理前方事務

，於是我們又隨節返京了。這次到許昌，不過一月，前後計算，軍事行動，也不過約略兩個月，這場糾紛，就告結束，也不能不說解決得快了。

不圖霹靂一聲，由天外飛來。於我們回京後不久，代行總司令職權的唐生智，在鄭州宣佈脫離中央而獨立了。當時我們實在奇怪。唐要這樣幹，為甚麼不在馮軍未敗之前和馮軍聯絡起來幹呢？何以在馮軍既敗之後，中央應付裕如的時候，有此異動呢？何不再等適當時機纔幹呢？大約他因為武漢空虛，所以想領兵直搗武漢，恢復他民國十六年武漢的局面。那知道被阻於漯河，於大雪之下，幾日激戰，他仍不能不離開軍隊，再去作寓公了。於是突然而起的高潮，又突然消滅下去。變幻莫測，何勝感慨。

當唐在鄭州異動的時候，在鄭州的中央機關和要人還很多，事前一無所聞。每晚和唐一起打麻將的朋友，也一些不知。當時經理署長俞樵峯（飛鵬）也在鄭州，唐看着打麻將的情分，沒有綁財神，請他安全的離開。鐵甲車司令蔣素心（鋤歐）因為是湖南人，被唐硬扣留幫忙。以後素心告訴我，當漯河戰敗之後，唐進退兩難。有天無聊，和素心等折

字，以決吉凶。當時擇了一個『道』字，於是唐決心逃走。因爲『道』字，暗示『首領要走了』。這也是政局動盪中的一個逸話。

同樣的時候——恕我記憶力不佳，時間不能正確記憶——兩廣的形勢很不穩，陳眞如的軍隊，不夠鎭壓。因此派和陳很要好的朱一民（紹良）統率湘軍毛炳文部和石友三的一大部，由海道赴粵增援。石部集中浦口待船。有晚深夜，我接着憲兵司令谷紀常（正倫）的電話，說石部在浦口叛變了。（好像這個時候，唐生智還沒逃走，河南正在打仗。）大家都以爲石部一定渡江，占據南京。因爲一方面以爲唐石已有聯絡，一方面那時南京只有一團多憲兵和軍校幾千學生，空虛極了。當晚南京大爲震動。誰知石唐竟沒有具體的聯絡和計劃，石部竟不渡江，呼嘯北去了。當唐生智異動的時候，每次給蔣的電報，自己都還稱『職』。因此，胡展堂先生有『造反猶稱職，退兵不渡江』的兩句打油詩。

到了民國十九年，蔣閻之間的關係，又漸漸惡化起來。聯馮的時候，用了馮系的薛篤弼做內政部長。打馮聯閻的時候，就任命閻系的趙戴文爲監察院副院長，又給趙丕廉做蒙

藏委員會委員長。但是閻系的要人，雖在中央任了要職，以任將閻間的意志疏通和感情聯絡，而關係的惡劣，終難免趨於白熱化。

十九年二月初，一電飛來，閻以禮讓爲國的理由，約蔣一齊下野。於是雙方一面打筆墨官司，一面調兵遣將。消息一天緊一天，馮也離開晉祠，回到潼關去了，馮閻聯合起來倒蔣了。當時由津浦線南下的，完全是閻軍，閻親自指揮。沿平漢線南下的是馮軍，沿隴海線東進的，閻軍馮軍都有，而以閻軍爲主體，馮則駐鄭州指揮。我又奉命隨同出發，大約是十九年五月，先到濟南佈置津浦線方面的戰略，再到隴海線。總司令部當然就在車上。當時閻馮軍已越過歸德，似乎在馬牧集，所以我們總部的專車，就停在碭山。開火以後，馮閻軍節節敗退，由歸德西撤。總部專車進至歸德，旋復進駐柳河。閻馮軍死守蘭封，於是變成了陣地戰，綿延了好幾個月，使我們不能不在柳河車站烈日炎炎之下的鋼車中消夏了。平漢線由何雪竹指揮，雙方旋進旋退，無大激戰。隴海方面，好幾次由正面舉行中央突破，但因爲閻馮軍的壕溝，又寬又深，損失很大，死傷很多，終不能進展寸步。

同時濟南被閻軍佔領了。如果當時閻軍乘勝直下，佔領徐州，隴海線後路截斷，我們就要回軍都不可能。所以當時情形，頗爲嚴重。我們在柳河，也很擔心。不過閻爲人持重，不敢冒險，兵力大約也不夠分配，所以沒有推進。正在這個時候，蔣光鼐、蔡廷楷的軍隊，由廣州調到津浦路反攻。李韞珩帶着一萬左右的湖南軍隊，由海道至靑島登陸，沿膠濟路向濟南反攻。我記得李韞珩到柳河請訓的時候，愁眉苦臉的到我車廂中說：『湖南兵士都沒有坐過海船，山東地形又不熟，此行眞是沒有把握。』李雖是行伍出身，却是一員勇將，以後也建了不少戰功。

津浦線反攻，節節勝利，不久，濟南又收復了。但是隴海線仍是曠日持久，我們總部的車子，只是停留於柳河或歸德之間。有時雖也開到野雞崗和民權縣的最前線去督戰，但是不過幾個鐘頭，仍開回原地。

我和力子隨節住在車上，陳雪暄（調元）和顧墨三（祝同）兩個人的司令部，都在柳河車站附近的小村莊。車上熱得不可耐的時候，便去他們的村莊『避暑』。每天晚上，必

定去的。我不會打麻將，使和不打牌的將領，上下古今的談個不休。照這樣，一個暑天也就混過去了。這個時候，有一段事情，不能不寫。當我們住在歸德的時候，有天晚上，我從夢中被槍聲和很大的轟炸聲所驚醒。只聽見侍衛長王世和大呼道：『火車頭呢！』因爲不預備開動，所以火車頭離開了列車，當時火車欲開不得。槍聲響了半小時始息。後悉是馮的騎兵，就是現任陸軍部次長鄭大章同志所指揮的，來襲飛機場，他們的任務，燒了飛機就回。誰知那時我們車上只有兩百多衛兵，車站上又沒有其他軍隊。如果騎兵逕到車站，主帥以下都要被俘。那末，那個時候以後的歷史，又是另外一個寫法。眞是氣數。不過那個時候，我們都學空城計的孔明，齊說一聲：『好險哪！』

在停頓在柳河的幾個月內，政治和軍事兩方面，都積極進行着很大的計劃。政治方面，就是張岳軍和吳鐵城奉命到奉天，勸張漢卿領兵進關。閻老西的代表，當然也在瀋陽。但是老閻捨不得用錢，而這邊却是揮金如土。以後小張果然領兵進關了。雖然不完全是化錢的結果，但是錢用得多，也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軍事方面，因爲正面攻擊，中央

突破，既不能成功，就不能不採取紆迴戰略。這次紆迴分幾路，而且規模很大。遠的一路竟紆迴到平漢路以西，去截斷鄭州以西的隴海路。軍事上各路紆迴部隊開始動作，且順利進行，政治上張漢卿於九月二十左右，發表通電，主張罷兵，一切靜候中央措置，同時部隊也向關內移動。因此，隴海正面的馮閻軍很快的撤退了。我聽見了這個消息，興奮得很，等不及隨總部列車前進，先和陳雪暄坐汽車進了蘭封城。沿途時常聽見對方所埋地雷的爆炸聲，僥倖我們的汽車，沒有碰着。在蘭封縣公署住了一晚，第二天總部列車到了。我回到列車，隨節進駐開封。到了開封，洗澡吃館子，高興極了。兵敗如山倒，我們跟蹤追擊，於十月初旬，到達鄭州。馮部梁冠英等親來鄭州，歸順中央。中原大戰，於此告終。

當時賀貴嚴（耀組）做徐州行營主任。他由京坐一列專車來鄭。他的太太和淑慧，坐着他的專車來鄭遊玩。此時蔣先生已飛回南京參加雙十節。我便搬到貴嚴的專車上，四個人一路歡天喜地的談笑到京，久戍回家，倒也開心。

在我們停滯於柳河的時期內，有兩事須要記述。第一就是共產黨乘着後方空虛，攻入

長沙，裹脅而去，到贛南設立了根據地。以後傾全國之師，費時三四年，還不能完全消滅，只是驅逐到西北，演成現在這樣的蔓延和猖獗。這都是那次中原大戰造成的。第二就是蔣胡之間，又發生了磨擦和衝突。原來蔣主張戰事結束，召開國民會議，制定約法。胡則反對。南京與柳河之間，電報往還，早已辯論好幾次。而蔣仍於十月初電請國民政府，召開國民會議，頒佈訓政時期約法。

返京之後，又因為張學良任副司令及張系人員來中央任職的問題，蔣胡意見，更形決裂。大約十二月初旬，蔣赴廬山，我也隨去。蔣在廬山對人發牢騷：『不願回南京，離南京越遠越好，想到西北去。』在這幾句簡單的話語之中，可見得當時蔣先生內心的苦悶和蔣胡感情之惡劣了。但他在廬山考慮的結果，決定了去胡的大計，所以不到三個星期，便仍回京。我們當時，是一點都不知道他下了這樣決心的。

到了民國二十年，彷彿是二月底，我因事赴上海。時張岳軍任上海市長，約我和力子到一家酒館吃飯。他問我們道：『南京昨天晚上的事情，你們知道了嗎？』我們都很吃驚

的齊聲答道：『不知道，甚麼事？』他說：『我也是剛纔曉得，胡先生被扣留了。』我和力子都吃一驚。這也不是一件小事。胡先生性燥，我們怕他自殺。至於西南，因爲這個問題，必有所舉動，乃是我們意料中之事。西北的活劇，方才演完，西南的舞台又要開幕了。果然，在五月間南京召開國民會議的時候，廣州召開了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對蔣聲罪致討了。

國民會議散會後，因爲江西的共匪猖獗，所以不能不先行勦匪，至對西南問題，則明弛暗張。此次我仍奉命出發。熊天翼（式輝）做行營參謀長。在南京開了幾次幕僚會議，籌備一切，好像在五月底，又出發赴南昌。從此由國民黨內部的戰爭，變成國共之間的戰爭了。回想起來，眞是傷心。假使十七年七月西山祭靈之後，大家都一心一德，埋頭於善後和建設，那裏會有十八年春的武漢和十八年冬的河南之役？那裏更會有十九年大規模的中原會戰？這次會戰，損失的物力和人力之多，實在可驚！沒有迭次內戰，共黨怎樣會猖獗，而發生連年勦匪的軍事行動？沒有由長江流域勦匪，發展成西北勦匪，那裏會有西安

事變？沒有西安事變，國家焉能到今日這樣支離破碎的局面？乃竟陰錯陽差的一幕一幕演變起來！氣數耶？國運耶？人爲之不臧耶？嗚呼！

南昌行營，設在百花洲的省立圖書館。我便在百花洲畔，找一個臨湖的平房寓居起來，並約以後曾經煊赫一時的楊暢卿住在我寓。雖然說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但是軍事仍是主要力量。步步爲營的堡壘政策佈置完畢，開始包圍的同時，一面仍策劃對西南的問題。七月間暢卿奉命赴香港祕密工作，對西南加以分化運動。不單派了暢卿，同時四面八方進行對西南的分化。以後畢竟運用上官雲相和余漢謀的郎舅關係，把余漢謀拉了過來。陳濟棠失去了這一部主力，也就不能不崩潰了。這是後話。

九月初蔣先生赴武漢。兩三天之後，電令我即行前往。長江好大的水！漢口全市，都變成了澤國。那時三雪——就是陳雪暄（調元）劉雪亞（鎮華）何雪竹（成濬）——都在漢口，我當時只三十四五歲，他們都和我很要好，把我叫老弟，招待我在大水泛濫的漢口，痛快的玩了幾天。現在海角天涯，魚雁不通，怎麼能令人不懷舊雨而感傷呢！

我到漢口的任務，就是要我草擬討伐陳濟棠的通電和告將士書及告民衆書。我心中又僻想，對西南的軍事要發動了。

在漢口不過四五天，一直回到南京。在南京一個多禮拜，又乘軍艦赴南昌。軍艦到了湖口，蔣改乘水上飛機先行。我們仍乘原艦，到第二天淸晨纔到南昌。總部的副官來接，說：「總司令上午就坐飛機回南京。請主任今天下午，至遲明天動身回去。」我眞莫名其妙了！發生了甚麼變故嗎？何以這樣急呢？跑到總部一問，却原來是瀋陽事變發生！我因爲雜務待理，等第三天纔和何敬之（應欽）陳眞如（銘樞）——陳是來奔走寧粤和平的——同乘飛機返京。

以後接着發生的，就是胡先生恢復自由。寧粤在滬開和平談判，京滬粤三地同時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蔣先生二次下野，孫哲生陳眞如主持南京軍政等極繁重、極複雜、極變幻的各幕，現在不必詳述。

關於第四次代表大會一問題，京、粤、滬各有主張，意見糾紛複雜，議論了許久，沒

有很好的辦法。結果乃是舊中委連任，增加中委名額，京、粵、滬同時分別選舉。我在京得票最多，佔出席代表百分之九十。當選爲第一名中央執行委員。如果舊中委不連任，也要重新選舉，我絕對不會當選第一的。當時朋儕戲呼我爲狀元中委。第四屆第一次全體會議的時候，因爲京、滬、粵三方都要把落選的人加進幾位做中委，於是以全體會議的決議，把三方落選而票數較多的，各補了幾名做候補中委。王陸一時作監察院簡任待遇祕書，也因此做了候補中委。因自撰一聯云：『豈有祕書稱簡任，居然中委出恩科。』時稱爲『恩科中委』。

第四次代表大會閉會後，蔣先生於十二月第二次下野了。下野之前，都有佈置，發表幾個省政府主席。顧墨三任江蘇，我以後也被派爲江蘇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了，這乃是徇墨三的請求。蔣先生原意，仍要我在身邊幫忙，因爲墨三以軍人而任封疆，沒有把握，要我幫忙，所以蔣先生也只得徇其請求了。

二十一年一月，上海事件發生以後，蔣先生又出山了。這次新設了軍事委員會，自任

委員長。接着國民政府遷都洛陽，在洛陽召開了國難會議。在寒風凜冽之中，乘着專車赴洛陽出席會議。洛陽在中國歷史上是有名的地方，我還是初次瞻仰，但是黃沙白草，滿目荒涼，懷古之情不禁悠然而生。

汪先生已於此時出任行政院院長了。此後數年之間，我因為出任地方行政工作，除出席中常會及中政會外，不多預聞中樞的事情。以後雖兼任中央民衆訓練部部長，乃是局部事務。除參加秘密組織之外，對於黨國大計，沒有預聞，所親身經歷的事不多，不過耳聞目覩罷了。其實這幾年內，除勦匪外，沒有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人民政府的喜劇，短時期內便解決了；廣西問題，時張時弛，但終未以兵戎相見，所以也沒可以述的。

我要特別詳述的，就是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汪先生在中央黨部被刺時，我所經歷的情形。

在大禮堂舉行了全會開幕典禮之後，便齊集到中央會議廳大門前去拍照。我站在 汪先生左側後面第二或第三排。當時新聞記者非常之多，秩序混亂極了。記得照相的說：

『各位預備，要照了。』這時不知道是誰說：『蔣先生還沒有來。』隨着吳鐵城大聲道：『蔣先生不來照。』照畢之後，大家轉身拾級而上。我行了兩三步後，忽聞背後鎗聲一響，聲音甚小，以爲是放爆竹慶祝。但是接着鎗聲又起，形勢大亂。我回頭一看，只見一個穿灰色大衣的人，拿着鎗向人羣中轟擊，於是大家向鐵柵門內急跑。我看見朱騮先（家驊）在我面前向地伏下，我也隨着他伏身而臥。剎那間，忽想這不是辦法，仍立起奔進鐵柵門，站在門內牆角隱身。這個時候，人聲嘈雜，槍聲大起，說時遲，那時快，忽見一人倒在我的面前，滿臉是血。當時驚魂未定，也沒有去細看是誰。後來鐵柵關了，槍聲止了。忽聽見有人說，　汪先生受傷了。我仔細一看，原來倒在地下的，乃是　汪先生，已經身中數槍了。事起倉卒，變生肘腋，所以那時震動、驚惶、懷疑等情緒，不僅充滿了我的心中，且支配了全場的空氣。同時一面接醫生，一面查緝凶手的餘黨。混亂、忙迫，而且緊張萬分。好容易醫生來了，把　汪先生護送到醫院，這纔開會。這一幕驚心動魄的情形，我畢生不能忘記。

現在再一述在南京所經歷西安事變所反映的情形。我當時仍兼民衆訓練部長，那天，在中央大學指導一個民衆集會。下午七時方回家。淑慧告訴說：『各方面打來了十幾個電話找你，蔣先生在華清池被張學良的亂兵包圍了。』這個消息眞是靑天霹靂，使我震動。當天晚上，中央黨部召集緊急會議。第一個問題，就是要趕快査明下落。究竟是生是死，毫無正確的消息。第二是如何處置。關於這個問題，分爲兩種意見。戴季陶何敬之等主張採取嚴正的態度，要爲國家立紀綱。孔祥熙等則遵從宋美齡的意見，主張緩和。關於辦法，有主張解鈴還須繫鈴人，這一幕是共產黨主使的，不便去對共產黨說話，但是要去找蘇聯。意見紛紜，議論複雜，直至夜深，沒有辦法。但是對於緩和論者的主張，大家都不便反對。因爲如果操之過激，逼着小張把蔣先生殺了，誰能負責。我回家之後，心想中國眞是多災多難。共產黨流竄西北，正要消滅的時候，忽然發生這樣的變故。此次一定是凶多吉少。小張既然下了這個决心，必定有個遠大計劃。卽使不立卽加以殺害，至少决不會馬上恢復自由。所以對於國家的前途，悲觀極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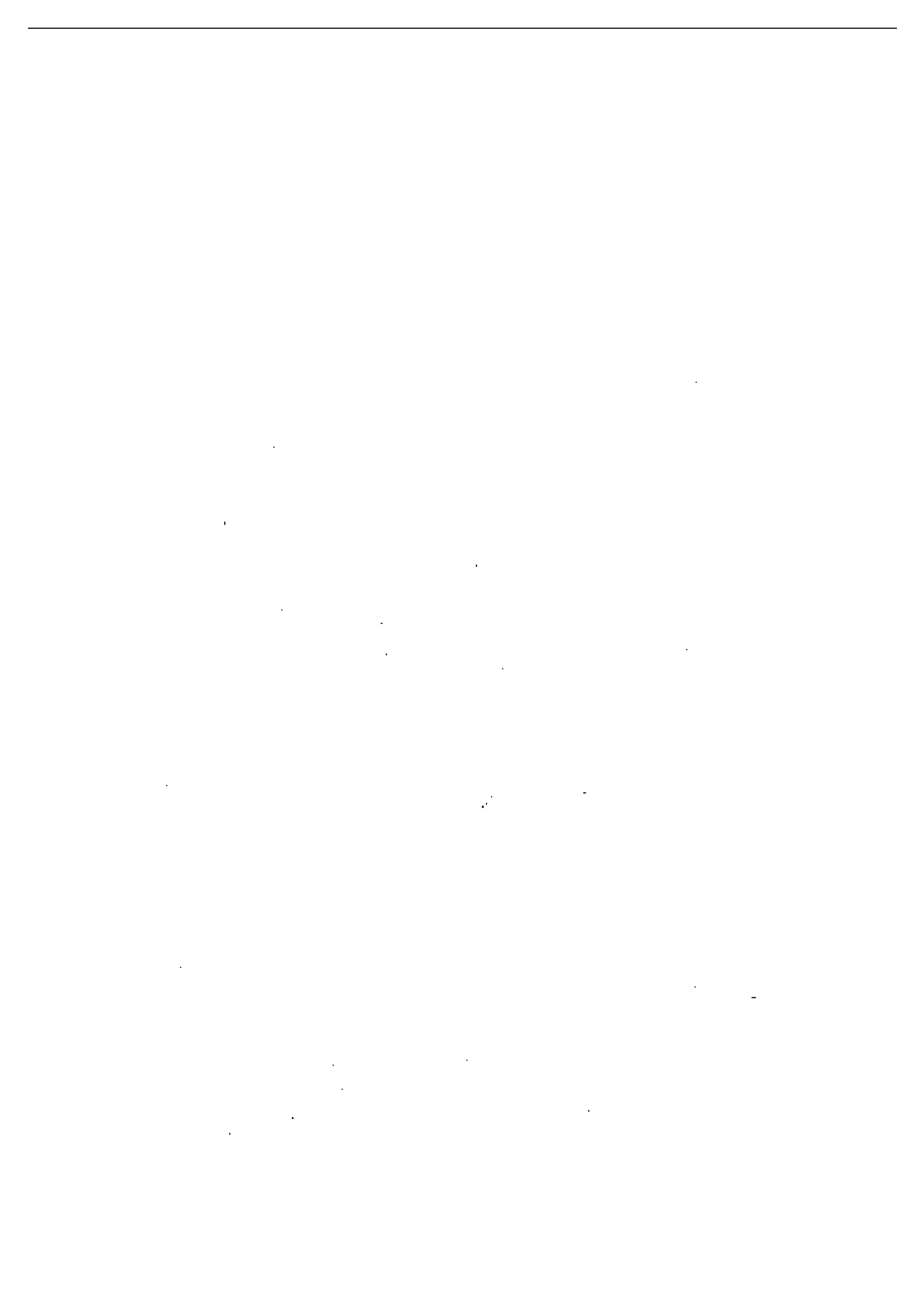
世界上的事，本來不能預知，這件事尤其使人莫名其妙。張竟親自送蔣到洛陽了。以兒戲始，以兒戲終，固然是一件荒謬絕倫的事，但是這一幕兒戲，却是中國歷史的轉捩點，沒有這一幕，那時以後的中國歷史，當然又是另外一種寫法。至今思之，猶有餘痛。

汪先生因西安之變而回國，廿六年一月抵香港。我和力子，奉命赴香港歡迎。不久召開中委全體會議，我奉命把民衆訓練部長讓出，仍請公博擔任。不數月而蘆溝橋之變起。事變以後的經歷，更加豐富，更加艱巨，更加變幻莫測。我以一個主角的資格，表演於政治舞台，還是此後的事，不過現在還不能公開，等到十年以後再述，現在就在此截止了。

把過去經歷的事，一一回想起來，好像白髮宮人，談開元天寶遺事，只落得徒增感慨，更覺悲傷。悲歡離合，成敗興亡的場面，一幕一幕的表演過去了。是眞是假，亦色亦空。把跑龍套的演員，頭也跑昏了，眼也跑花了，神也跑迷了，深深的感覺浮沉於茫茫人海之中，和起落不定的政潮之內，得失升沉，都不過是曇花一現！所以夜深人靜的時候，幽居獨念，眞欲跳出十丈紅塵，避世唯恐不遠，入山唯恐不深！

但是身世之感，雖常令人發生出世之想，而家國之愛，却不能不令人鼓舞餘勇，堅定貫徹初衷的決心。尤其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環境，正是周公恐懼流言，王莽謙恭下士的時候，是非未定，功罪難分。如果半途而廢，雖存周公之心，終成王莽之果，上何以對祖先，下何以對子孫！後世的批評，我們可以不必去管，流芳百世也好，遺臭萬年也好，無聲無臭，與草木同朽更好，『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爭唱蔡中郎』，但是個人的是非，固然不必計較，國家的利害，却不能不加考慮。自古孤臣孽子的用心，不在求諒於當時及後世，乃在使個人的苦心、努力，和犧牲，實際有益於君父。所以現在距我們企求的目的，雖然道路崎嶇，關山險阻，但是救傾扶危的目的一日不達到，就是我們的責任一日未解除。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那裏能夠因爲人事滄桑之感，而改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呢！

（附記）以上所述事實，全憑記憶所及，時間容有前後倒置之處，讀者諒之。



走火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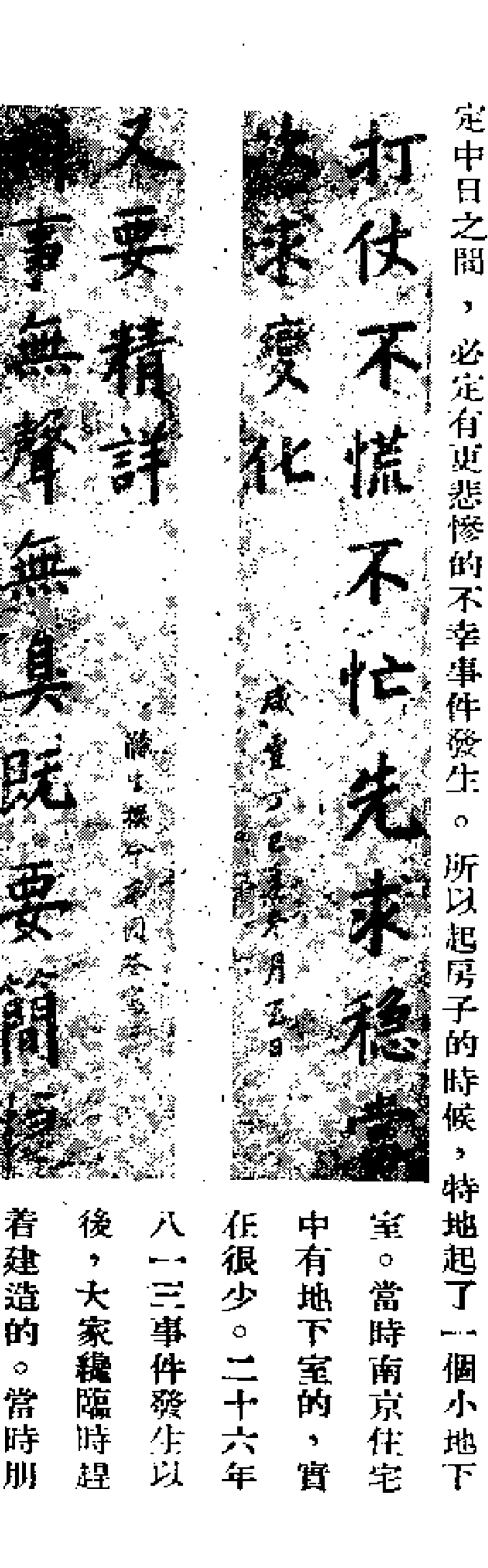
一月十一日下午三點十分鐘，屋頂上不曉得甚麼原因，忽然發起火來，當時風力又特別的大，不到半小時，三樓和二樓，就燒得精光。以後雖然消防隊趕到，救了最低的一層，但是已經不能再用了，所以可以說全部房屋，付之一炬！

房屋這樣的身外之物，要燒就燒，有甚麼留戀？更何用傷感？不過這所房子，是有相當的歷史的，尤其和這次的和平運動，淵源極深，所以不能不爲之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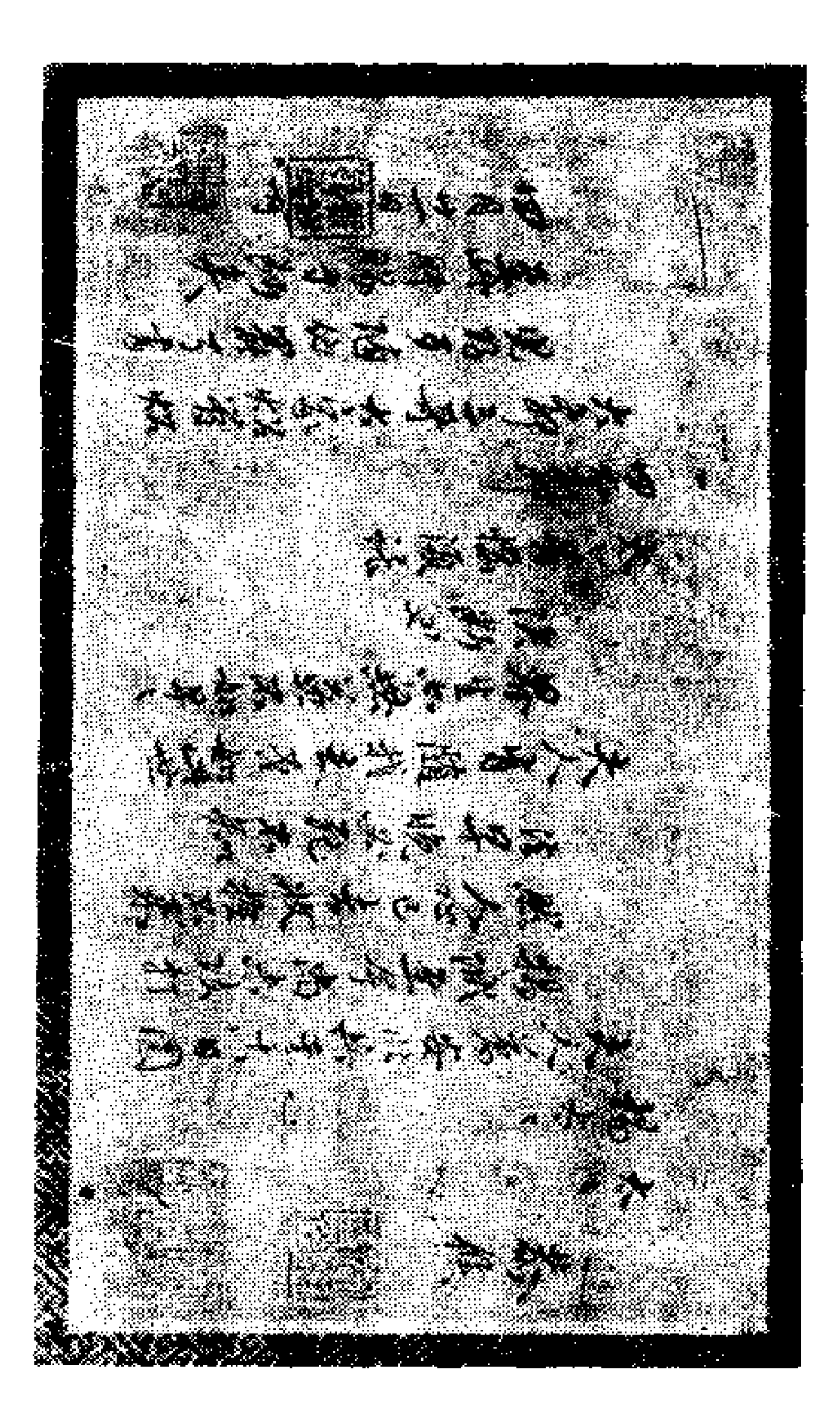
這所房屋，地點極佳，環境也很優美。三面環塘，風景非常秀麗。這塊地皮，是民國十八年買的。那時我和賀貴嚴（耀組）及谷紀常（正倫）三人，湊了一些小款，置了一些地皮。這塊地皮，也在其中。後來因爲我要起房子，所以紀常便帶我到這裏來看。當時是一片竹林，池堤上滿栽垂柳。翠竹垂楊，映着春水綠波，好像一幅圖畫。我當時高興極了，

便決定在這裏建築一所房屋。於是便在二十一年四月底動工，十一月完成，我們於十二月遷入的。現在算起來，這所房子的生命，剛剛是十年。在這個十年之中，除却二十六年隨着國府遷都撤退南京，至二十九年國府還都的兩年多之外，都是起於斯，坐於斯，飲食工作於斯。回憶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撤退南京時的情形，真如隔世。清晨起來，在淒風苦雨之中，一個人驅車赴陵園，向　陵墓叩別，飽嘗『最是不堪辭廟日』的淒涼滋味。回得家來，每一個房間，都徘徊了很久。心想此去歸期未卜，再會無期，滿腔懷着留戀的情緒，終於離開此屋了。二十九年還都的時候，重返故巢，看見桃花如故，池水依然，但是周圍的垂柳，和一片竹林，已經連影子都沒有了。回想兩年之中，主人雖已遠離，而『庭樹不知人去盡，春來還發舊時花』。滿園春色，今因主人的重回，一樹一木，都覺得格外風光。於是稍加修理，重復入住。我的家庭，遂隨着政府還都而還家。好像不能再見的舊雨，居然重逢一樣，愉快的心境，遠過酸辛的情緒。現在刼後歸來，相依爲命的棲身之所，忽然化爲灰燼，物質損失固不必計，精神上焉得不依依留戀，忽忽若有所失呢！

道所房子動工的時候，正是二十一年一二八上海事件之後。一二八事件，雖然以淞滬協定而結束，但是中日雙方的空氣，還是非常惡劣。並不是我事後有先見之明，我當時斷定中日之間，必定有更悲慘的不幸事件發生。所以起房子的時候，特地起了一個小地下



室。當時南京住宅中有地下室的，實在很少。二十六年八一三事件發生以後，大家纔臨時趕着建造的。當時朋友們知道我家裏有地下室，所以有些朋友搬到我家裏住，有些臨時來躲警報。先後搬來住的，武的有顧墨三（祝同），熊天翼（式輝），朱一民（紹良），李師廣（名揚），文的有梅思平，羅君強，陶希聖。每日必來的，就是高宗武。至於其他臨時來躲警報的，那就很多了



。我們這些人，都是主張在相當時期，結束中日事變的。在當時抗戰到底的調子高唱入雲的時候，誰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調。所以我們主張和平的這一個小集團，便名為『低調俱樂部』。這個名詞，彷彿是胡適之取的，因為他也常在座。說也奇怪，當時往來於這所房子的人，大多是主張和平的。所以我們當時說笑話，如果和平實現，一定要在這屋前的草地上，立一個和平紀念碑。現在全面和平，還遙遙無期，而這所房子却先化為灰燼，不能看見將來和平紀念碑的建立，我們焉得不為這所房子痛惜呢！

我家裏沒有甚麼珍貴物品，除却日常用具之外，沒有甚麼損失。不過名人字畫，却燒了不少，實在是太可惜了。其中最可痛惜的有兩件：一是史可法的遺書。在揚州將要陷落的時候，史忠正寫信給他夫人和如夫人道：『恭候太太。楊太太。夫人萬安。北兵於十八日圍揚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來。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隨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無益，不如早早決斷也。太太苦惱，須託四太爺大爺三哥大家照管。焅兒好歹隨他罷了。書至此，肝腸寸斷矣。四月二十一日法寄。』寥寥數語，充分表現忠烈悲

壯之氣，我暇時常常拿出來鑑賞。每次鑑賞，都發生異常的感慨。今後不能再見了。二是曾文正撰句，令其弟國荃所書的聯語：『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穩當，次求變化。辦事無聲無臭，既要簡捷，又要周詳。咸豐丁巳年冬月季日滌生撰，命弟國荃寫。』我常把這兩句話，當做我治事的格言。現在已懇求　汪先生照這兩句話，為我再書一聯了。此外還有不少有名的書畫，都是有錢買不到的。不過我是湖南人，對於吾鄉先賢的墨跡，如左文襄的字，彭剛直的梅，尤其覺得惋惜。

有兩件東西，却是不幸中之幸。一是　總理於民國十一年，親筆修改的三民主義演稿；一是曾文正所書的『風生江浦千帆曉，月滿山城一笛秋』。這兩件可寶貴的東西，當天以為一定是付之一炬了。誰知第二天淑慧去檢查的時候，在火餘的亂堆裏面，忽檢出　總理的遺墨。只是封面和周邊燒焦，字跡一點沒有損壞。真是　總理在天之靈的庇護了。她再走到書房的原址，看見其餘東西，都已燒得乾乾淨淨，只有曾文正這一聯，還掛在壁上，絲毫沒有損壞。這也是奇蹟了。

燒得正猛烈的時候，第一個親來慰問和照料的，便是　汪夫人。她聽見這個消息，立卽就跑來照料，並恐怕我們沒有棲身之所，立卽電話民誼，把他的房子，容出幾間。因爲民誼夫人去上海，房子可以空得出。隨着她又陪我們到了民誼家中。這個時候，　汪先生還不知道這個消息。她便親自打電話去報告。　汪先生這個時候，正在會晤松井中將。他接着　汪夫人的電話，急得把松井中將撂在座中不顧，披起大衣，車子也不坐，立卽步行到民誼家來慰問。患難之中，纔能見眞的交情，　汪先生和　汪夫人這樣的隆情盛誼，我是畢生不會忘記的。

中日的友人，都紛紛來慰問。中國友人說：『火燒旺家。』日本友人說：『燒太』。(押凱普陀里)(就是越燒越大的意思。)他們以爲我燒了房子，一定很不痛快，所以拿這些成語來安慰，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好意。但是在這樣河山破碎戎馬倉皇的時候，比房子起火更要嚴重，更要悲慘的事態，我們都應該準備着隨時去遭遇！



自反錄

『人苦於不自知』，這句話我們常常聽見，足見知人固難，知己也非易事。但是一個人如果連自己都不知道，那裏能夠好好的處世接物呢？我常常站在我自己以外，來批判我自己；換句話說，就是以客觀的態度來反省，看看我自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我平日的習慣和做事的作風，是好或是壞。今天擇其可以發表者寫出來去清償『古今』的文債。這篇短東西，是赤裸裸描寫個人的性格，既無護短之心，更沒炫長之意，不過自反而已。

我最沒有恆心。無論做甚麼事，都是或作或輟，半途而廢。除却晚上記日記，飯後睡午覺兩件事，十年如一日之外，沒有一件事能夠繼續長久的。平日也學了一些修養的功夫，衛生的方法；平日也定了一些讀書的計劃，處事的程序，但是都是一暴十寒。所以弄到年將半百，一事無成。道德文章，學問事業，一無成就。這都是無恆的結果。這個毛病

如不痛自針砭，將來一定是與草木同朽，那裏能爲天下國家，負擔責任！

我是一個率眞的人。這一點，我的朋友都有共同的認識：喜怒不現於詞色，我是絕對做不到的。三句話不投機，便面紅耳赤的爭起來。要想說甚麼就說，不知隱藏，不知顧忌。要我說假話，是萬不可能的。因此做起事來也是走直線。轉灣抹角的走曲線，不單是我自己做不到，而且和這類的人談話或共事，眞要我的命。但是這究竟好不好呢？民國十七年戴季陶先生撰書一付對聯送我道：『困學乃足成仁，率眞未必盡善。』這眞是對症下藥，針砭我的知己之言。因爲我無恆，所以季陶要我『困學』。至於率眞，他老實說未必盡善。影佐少將曾和我論做事的方法，他說：『做事不可用詐略，但不妨用謀略。』這也是勸我做事不要過於率眞，不要太走直線。這些好朋友對我的規勸，於我是非常有益的。

我的記憶力很不好。在學生時代，曾用了七八年的苦功，想成一個學者。但是最後，我自己因爲絕望而放棄了這個野心。因爲『博聞』之後，要『強記』纔行。博聞而不能強記，任憑讀了多少書，有甚麼用處？但是說起來奇怪，我做起事來，卻比較有記憶力。很

小的事情，當然也常常忘記，但是比較重要的事，我却一件沒有忘過。現在我每天頭腦中，不知要裝多少複雜而不連貫的事，而且這些事都要去做的，但是竟沒有因爲忘記而誤一件事。每每和日本朋友議事的時候，他們都拿出一本小册隨談隨記，我却沒有記過。有一次和影佐少將商量許多要緊的事，他照例的筆記，看我仍不記，便勸我道：『你不要仗着頭腦好，還是記下爲妥。』讀書沒有記憶力，做事却有記憶力，是不是古人所說的『酒有別腸，詩有別才』的意思呢？

用人還是將將好呢？將兵好呢？這當然是看怎樣去運用。但我的性質，是完全將將的。一件事交給一個人，完全是『委任責成』，不猜疑，不牽制。委一個人做一件事，在他的左右前後，派一些人去監視，在我的天性上是絕對不願做的。數年前和熊式輝論用人，我本着『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老生常談，他却主張『用人必疑，疑人必用』的走偏鋒的辦法。他說像我的辦法，一定弄到太阿倒持，尾大不掉。我說這完全看所用的人如何，所將的將如何，如果所託非人，當然有這樣的毛病。所以『知人善任』，乃是先決

的條件。我的將將的辦法，當然也上過一兩次當，但是大體是成功的。不客氣的說，對於『知人』這一點，我雖然沒有十分的本領，但是確有七八分的自信。

我覺得弄手段，是最蠢不過的事。我聰敏，人比我更聰敏；我會弄手段，人比我更會弄。即使人家被我欺騙一次，決不會再度或三度被騙。等到一被人發覺，那便一切都完了。所以我治事待人，都是老老實實的開誠相與。曾文正大家都知道是以誠待人，以拙治事的。但是他最初却是相當的用權術，弄手段。從他的經驗中，知道權術有時而窮，手段有時而盡，所以他改變作風，以誠以拙。雖然到了他的身後，還有人批評他是僞君子，這未免過於苛刻。我治事待人，一向也都本着誠拙兩字，究竟這個作風會成功或失敗，那就管不得許多了。

富於情感而面子軟，是我的長處，也是我的缺點。當面被人請託或要求，很不好意思拒絕。人家常常利用我這一點，我也曉得因此常被人利用。我的好朋友常說我是好好先生，太『易與』了，勸我要『厲害』一點。我也常常這樣想。但是我的結論，是聽其自然

罷，寧人負我，毋我負人，個人吃一些虧，上一些當，也算不得甚麼，何必計較？

容易衝動，也是我最大的毛病。這也是率眞的結果。常常感情用事，理智都不能克服，因此引起不少的反感和誤會。這個脾氣，雖然居心無他，究竟不可爲訓。關於這一點，因爲常常痛自抑制，火氣比以前小得多，我的朋友，都也知道，樸之默村等常常說我進步得多。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衝動的時候，仍然難免。

做事敏捷而果斷，是我的習慣。這乃是性急的結果。但是果斷的結果，易流於輕斷。一件事的利害得失，沒有考慮得非常周密，遽下判斷，遽去實行，實在不算『老練』，怎樣能使果斷不變成輕斷，怎樣能使深思熟慮不變成遊移不決，是今後要下苦功的地方。

有相當魄力，是我自負的地方。說做就做，說幹就幹。一件事只要認爲正當，而決心去做，是不論成敗，不顧毀譽，不計得失，一定要幹到底的。但是因爲上述的有時容易由果斷而流爲輕斷，過去也許有了不少錯誤的認識，所以對於任何一件事，正確的認識，充分的理解，和其前因後果的適當的考慮，作我是絕對的必要；否則，生存活動，鹵莽滅裂

的情形，恐不能免。

勇於負責，也是我的天性。我常常想為國家做事，為領袖服務，不僅要任勞，而且要任怨。但是自古任勞易而任怨難，我以前也曾考慮過，何必怨尤叢集，使一身成衆矢之的？但是我仍以為應該做的事，應該說的話，應該不顧毀譽，不計恩怨，要負責去做去說的。不過最近也許我世故漸深，漸漸的失去這個特性了。這究竟是進步或退步，實在難說。不過我總想務必保持我的天性，或者方法巧妙一點，使一方面仍舊負責，一方面不招怨尤。

我性情疏懶，不好應酬敷衍。見我見不着，請我請不到，人來拜訪，我不回拜。所以許多人以為我架子大。其實我服官十五年，仍不脫書生本色。我的朋友，都知道我言語行動，生活習慣，仍完全是學生派。不過無謂的應酬，我實在是不願意。但也絕對不是不合人情的孤癖高傲。因公來見的人，無一不接見的。有意義的宴會，沒有不到的。不回拜人，是我的不對。但是全因疏懶或事忙，決不是擺架子。不過因個人的請託或無聊的事來

見的客，對不起，我實在不感興趣，而且也沒有這些寃枉時間。又如每天接着投効請任用的信，不知多少；對於這些信，究竟回不回，實在費了我不少的考慮。我想人家既發一信，當然有無窮的希望，每天等着回信。如不回信，難免令人失望。但是又想如有辦法而回信，人家自然喜歡，如果只是『相機設法』、『存記候用』等類敷衍的信，雖說『相機』，永遠無機，雖說『候用』，永遠不用，那不是仍叫人失望？如回信說沒有辦法，也一樣的令人失望。所以我便決定：有辦法，就回信；無辦法，對不住，只好不回了。人家要罵由他罵，且爲公家省些紙張，且爲我的祕書省些時間吧。

要寫的還很多，不必再寫下去了。總而言之，我自反的結果，覺得我做人固然有許多缺點，但是長處多於短處。做事固然也有些優點，但是短處多於長處。這便是我自己對自己的總評。

記周佛海先生

左筆

在舊曆新年久陰乍晴的一天，記者承『古今社』朱社長的介紹，特往拜謁大名鼎鼎的『和平運動總參謀長』（註）周佛海先生。

愚園路中一所半新半舊的洋房，前面包圍着一片小小的草地，那便是周先生的寓宅。記者投片之後，就在樓下的小客廳裏恭候。客廳的四壁懸着 汪精衛先生的字和齊白石老人的畫，鐵劃銀鈎，令人神往。廳裏略具椅桌數事，簡單整潔，幽靜異常。當記者正在鑒賞一切凝神靜思之時，不知不覺的忽然周先生已跑進客廳裏來了。

一位體格壯偉英氣逼人的周先生，與記者往日腦筋裏所幻想的年齡很大而道貌岸然的周先生截然不同！周先生的大名至少我已欽仰了二十餘年之久，遠在新文化運動時代，記

者就已在國內諸大雜誌上拜讀他的大著，怎麼今日一見，依然丰姿翩翩還是一個青年紳士呢？

寒暄之後，周先生即一見如故的與記者暢談一切。懇切的態度，爽利的談鋒，在短短的十幾分鐘之內，已將他的豪爽痛快的個性，充分地流露出來了。

據周先生自述，他生平唯一的個性，就是心裏有什麼事嘴裏就說什麼話。他不曉得什麼叫做『謀』，更不曉得什麼叫做『術』。此外他還有『三不』個性：即(一)不修邊幅，(二)不事生產，(三)不好應酬。他說他最怕剃頭，不受逼迫是決不肯自動理髮的，所以常常要兩三個月才理髮一次。一件衣服穿上身後就永遠的穿着，不是他的夫人要他換，他決不會換的。他自己不曉得寒暖，不知道飢飽，每天的飲食起居全是由他的夫人當心照料的。所以每逢他與他的夫人不在一起的期間，他常常要患傷風及胃病。(記者按：這一點頗有餘杭章太炎氏之作風！)

對於金錢他是素來不很重視的，雖則他的幼年和少年時代都是從極困苦的環境中度

來。正因如此，所以他現在收入的大部分盡用之於救濟困難的朋友和不宣佈的慈善事業。他說這樣的用錢在精神上是極感愉快的。

他在南京是應酬最少的一個人。不是因爲萬不得已，他決不請客；也不是因爲萬不得已，人家請他，他決不到。人家知道他的脾氣，以後索性不請他了。所以他晚上是非常清閑的，時以瀏覽書報爲消遣。有一天，德國公使飛歇爾氏請他吃飯，問他道：『每次公開宴會中，何以都不看見你？』他說：『我今晚承你招待，來和你談談，在我是算很特別的。』湊巧第二天有個公開的宴會，德使說：『那麼明天的宴會，恐怕又看不到你了？』他說：『被你猜着了！』說罷兩人大笑。

周先生對於事業方面所感興趣的是政治訓練工作與文化宣傳工作。所以，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時期，他做黃埔軍官學校武漢分校的秘書長兼政治部主任。（時蔣中正氏任校長，鄧演達氏任代理校長，張治中氏任教育長。）民國十八年至二十年間，他做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訓練總監部政治訓練處長。民國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他做中央

黨部民衆訓練部長。八一三事變後，他先在南京做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按大本營大元帥爲蔣中正氏，第二部所司者爲『政略』，部長爲熊式輝氏，此係戰時體制，始終未經實佈者。）繼在武漢做中央黨部宣傳部長，直至和平運動開始時爲止。他說他生平所最怕做者有兩件事：一是外交，一是財政，因他的個性如上所述，既不長謀術又不事生產也。可是當和平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就是第一個辦外交的人；國府還都後，他又就第一任的財政部長和第一任的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可謂怪極。他又說他最不感興趣的亦有兩件事：一爲教育，一爲警察。當昔年初到日本留學的時候，有人勸他考高等師範，他不願意，又有人以爲日本的警察辦得好，勸他學警察。他也不願意。可是後來在八一三事變前他在江蘇做了六年的教育廳長，國府還都後又兼任第一任的警政部長，亦可謂怪事。周先生說到這裏時，喟然長嘆曰：『天下事的離奇變化，眞出人意外！』

後來談到個人的嗜好，他說最愛讀杜詩，看電影和遊歷名山大川。可是現在因環境和地位的關係，不能出去看電影和遊覽，至以爲憾。談到此時，記者偶然聽得隔壁悠揚的琴

聲，一經打聽，原來是他的女公子在練習鋼琴。提起這一件事，周先生說最近有一個極爲幽默的笑話。原來周女士請一個俄國女人教彈鋼琴，有一天那個俄國女人問周女士的父親是何人，周女士隨手以一張中央儲備銀行鈔票上周氏的簽名示之，那個俄國女人失聲大呼曰：

"Oh, you have a good father!"

周女士立卽以極流暢的英語答覆道：

"If he were a begger, then I shall have a bad father!"

在彼此哈哈大笑聲中，記者遂起身告辭，歸來後腦筋裏留了一個不可磨滅的愉快而與奮的印象。

(註)日本報紙及雜誌上對於周氏俱作是稱。



附錄（二）

訪周佛海先生一夕談

書生

一個偶然的機會，走謁周佛海先生於其寓邸，與座者皆爲文化界人物，『古今社』朱社長樸之，亦是日座客也。暢聆偉論，印象良深，因就記憶所得，拉雜書之，工拙非敢所計，記實而已。——作者謹識。

讀了古今半月刊第九期周佛海先生的『自反錄』，便對於這位人物發生濃厚的興趣。自來的政治人物，總好比廬山的面目，不肯以眞相示人；而周先生却這樣的率眞，坦白地解剖自己。這種獨特的風格，即在西方政治家中，也很難求得的。

周先生在我這樣身份——即以一個年青的新聞記者自居吧——的人，決不是一個生疏的人物，遠在國民革命時代，與我同樣年齡的人，都已心目中有這樣一位人物的名字了，那便是周先生不朽的巨著——『三民主義理論的體系』一本書，凡是解釋三民主義的書，

恐怕再不能好過這一本，讀過的人總是衆口一詞的。

周先生的演講，也是使人諦聽不厭的，他在江蘇教育廳長任內的公開講演，每次我必前往聆聽，只是不能有機會和他交談，並一覘他燕居時的風度，至今還引以爲憾事。這一次居然因偶然的機會，承約到他的寓邸去談談，我便欣然命駕，不肯失却這次寶貴的機會了。

周先生是現任的財政部長兼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一般的想像，以爲他的起居生活，一定是富麗無比的了。但我所投刺晉謁的地方，却是一幢半舊的洋房，門前一片小小的草地，會客的客廳裏，也是佈置得樸素無華，乍然一見，只當是置身上海中等人家的住宅而已；萬想不到主人翁却是一位掌理國家度支的人物。因此使我想起『古今』創刊號中左筆先生一文，說到周先生自述的『三不』個性：『一不修邊幅，二不事生產，三不好應酬。』誠非爲虛語。近代中國官吏之起居生活，鮮有不窮奢極侈者，尤以留學歐美回來的留學生爲最甚，像周先生這種以身作則的作風，實在是令人欽佩無已的。

有六七年不見周先生，似乎覺得他身軀高大了一些，衣飾還是那麼隨便，一襲縕袍，不脫書生本色，眉目間英銳之氣逼人，覺得包蘊着無限的豐沛精力。周先生的大名，雖已傳誦於人之口者二十餘年，但是他依舊是一個年青的戰士，一些不露出蒼老的形態來。

這時在座會見的人，連我已是五人了，都是文化界的人物。所以周先生一見，寒暄之餘，立刻把談鋒轉到文化上。周先生認文化爲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最主要的命脈，國家或民族若沒有自己的文化，雖具備了其他的條件，於立國還是無助；反之，只要有文化的保存，則雖一時受着艱難，總有復興之一日。因此，在建國的現階段，什麼問題都無過於文化的保存和復興，大家不能捨本逐末而忽略這個問題。

周先生雖然不是政府的文化部分的主管長官，但京滬各大報除了官辦的中華日報外，他是國民新聞、新中國報、平報和中報的董事長，所以他對文化界之關切，是非常顯著的。他對於時下的出版物，差不多都會加以寓目，而且每一種都加以切當的批評。他認爲從前和平運動時期那種刊物已經過去了，而那種刊物成績之所以不大好之故，乃在於主辦

者未能專心從事，以後的出版物當然要實事求是，放棄這一種作風，而於從事復蘇文化着眼。現在的出版界，已很明顯的轉向這一條道路了。言下表示不勝其關切的樣子。

目下出版物風起雲湧的現象，周先生認爲是極好的。開這個風氣的，『古今』月刊的於今春創刊，無疑的可推爲第一炮。這時在座的該社社長朱樸之先生立刻表示謙遜之意，並謂『古今』之所以能倘有成績者，乃是全由私人辦理，故能以最少的資力，而發揮最大的人力。若一經官辦，便很難弄得好了。

周先生對於『古今』的批評，以爲『古』的太多，而『今』的太少，應該加些翻譯文章進去，使『古今』得以名副其實。這一批評是很對的，我的觀點也和周先生相同，但據樸之先生的解釋，認爲加入譯文，要破壞『古今』已成的風格 不如由古今社另行刊行一種刊物，專談東西方生活文化的，周先生也覺得很以爲然。

周先生所密切關心的，不獨是和平區內文化的情況，對於各種有關文化的情事垂詢得很詳細，而且還十分關切着遼遠的人們。周先生說，他在民國廿七年任中央黨部宣傳部長

的時候，與文化關係密切的紙張，在內地已很見困難，現在過了三年，不知道他們用什麼東西來印刷報紙刊物，言下不勝其感慨的樣子。兵兇戰禍，原是文化的最大的敵人。

周先生現在雖然不是文化機關的主管長官，而是幹着他自認爲不合興趣的財務工作，但始終不曾放下筆桿。所以一談起出版和宣傳的事業，他馬上回復當年文化戰士的姿態，全神貫注的暢論着。凡是他所指摘的和揄揚的，無不一針見血，全是內行人的見地。周先生戰前曾主持過『新生命書店』，出版轟動一時的『新生命月刊』，戰後又主持『藝文研究社』，出版了很多種富有價值的『藝文叢書』，到現在還留下無上的成績。

座客中有一位，認爲雜誌報紙出版的衆多而單行本刊行的消沉，乃是矛盾的現象，現在書籍的出版，簡直可以說是等，大衆所需的精神食糧，只是把存書和舊書來充數，這樣下去，將來必有無書可讀之一日。而平時爲出版事業大本營的幾家書店，又都經濟斷絕，處此印刷材料高漲之日，無力印書，長此以往，實在是令人寒心的事。

周先生就說扶助文化，獎勵出版，是當局應負的責任，假如出版界有什麼困難的

話，儘可向政府商請援助。爲我們下一代着想，一定不能使文化界萎枯下去的。

談到這個時候，已費去周先生不少的時間，這天雖是星期日，但周先生還是有許多要務待理，我們只得起身告辭。在歸途中，覺得此行眞是不虛，周先生是湖南人，一夕之談，很令我領略湖南人的豪邁風度，絕似置身老湘營中，與曾左諸賢晤談。記得民初有一位先生曾這樣說過：『有湖南人在，中國是不會亡的。』我在今日承認這一句話。